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對真實的熱情？

中國共產黨調查文化的形塑與實踐（1930-1949）

A Passion for Facts?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Survey

Culture in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30-1949)

郭淨仁

Ching-Jen Kuo

指導教授：羅士傑 博士

Advisor: Shih-Chieh Lo, Ph.D.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June 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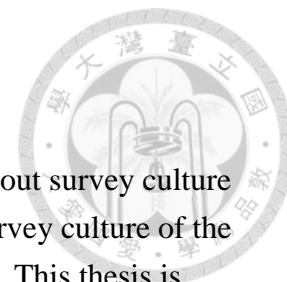
摘要

為何「調研」兩字能夠讓一個山間聚落的農婦理解到千里以外學者來訪的用意？本論文從這樣的疑問出發，試圖理解到底「調查與研究」為何能夠在當代中國深入老百姓的腦中。為了解決這個疑問，本論文從毛澤東調查的起點出發，沿著廣東、尋烏再到延安，追尋調查文化如何透過毛澤東引進到中國共產黨。除序章結論，全文共分三章。第一章，透過毛澤東農講所的經歷到《尋鄔調查》文本的形成，點出共產黨調查本身邏輯的特殊性；第二章則以長征後毛澤東如何運用「調查」建構路線正當性奪權，並藉由延安整風將調查文化的引進至中國共產黨中；最後，以 1947 到 1948 年晉綏土改中所發生不斷調查的反應與結果作為調查文化的實踐。透過三個環節一探中國共產黨調查文化的形成經過以及運用過程。

本論文之貢獻，最直接來說除了提供一套有別於中共自身對於調查文化形成的論述外。更重要的或許是在於解明為何在中國「調查」能被上升如此重要的原因以及此種論述的突破口。毛澤東並非黨內唯一作調查的人，為何他的調查如此重要？「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這句話背後的脈絡與意涵又是如何在該篇文章完成後接近 10 年才被發揚？能夠解決問題的共產黨，透過調查到底是解決了誰的問題？本文透過以上的疑問對於中共的官方論述產生質疑，以此開展出本論文的結構。期能對於中共調查文化以及毛主義等研究提供一條新方向。

關鍵字：調研、調查、《尋鄔調查》、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毛主義、
中國共產黨調查文化

Abstract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A Passion for Facts*, the discussion about survey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seems to have settled down well. However, the survey cul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ppears to be missing in the book. This thesis is trying to fill in the gap. In the first chapter, I trace Mao's early footprints of survey and point out CCP's unique logic by comparing Mao's survey with local survey. In the second chapter, I focus on the rising of Mao, especially on why "survey" could become the crucial part in Maoism. Then through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the idea of Maoism became rooted in the party members. In the final chapter, I use the case of the 1947-1948 land reform movement in Shanxi-Suiyuan region and compare different surveys conducted in these years. The conflicting results show that the surveys may not be as neutral as they claim to be. In fact, even before the investigation begins, the survey already holds its answer. 'To seek truth from facts' may sound more like 'to seek truth from the need' in the practice of CCP's survey culture. In sum, CCP's survey has two characteristics: it is a means to justify revolution, and it is also a way to defend Mao and Maoism.

Keywords: Maoism, survey cul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 Passion for Facts, Report from Xunwu, survey.

目 錄



緒 論 調查能告訴我們什麼？.....	1
何謂調查？.....	1
從現代化到正當化.....	4
竊取與運用.....	7
突圍與發現.....	9
第二章 《尋鄔調查》的兩條足跡.....	11
調查與毛澤東的淵源.....	13
《尋鄔調查》與尋烏的調查.....	18
《反對本本主義》的後盾：《尋鄔調查》.....	22
小 結.....	25
第三章 由外而內：作為政治文化的共產黨調查.....	27
國共的異與同：話語權的運用與選擇.....	27
從調查到調查文化：材料到論述的演變.....	31
整風、審幹中的「好共產黨員」.....	35
調查為何作為一種文化？.....	39
第四章 晉綏土改與糾偏—調查、複查、再調查.....	43
土改前的調查與階級.....	46
不斷建構的表與裏.....	51
楊家溝會議：糾偏的展開.....	56
「調查」的運用.....	63

結 論 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67

徵引書目.....71





緒論 調查能告訴我們什麼？

乾脆，一言以蔽之，若要找出一條民族自救的出路，建設國家的辦法，必先根本了解中國國家本身的內容。可是若要根本了解我國社會的內容，非先從社會調查入手不可。這種調查必須為科學的，有秩序的，有系統的。¹

李景漢，〈社會調查在今日中國之需要〉。

猶記得 2015 年第一次隨老師下田野的時候，在贛南尋烏的一個小地方司城面臨到的問題。當地方上的大姐問到為何要特地來這個沒啥好看的小地方時，帶我們的朱忠飛老師一句：「來做調研的」對方馬上露出理解神情的剎那，給了我很大的衝擊。到底為何一句「做調研的」則不論多偏僻地方的大哥大姐都能快速的接受並開始回答問題呢？待參觀尋烏調查紀念館後，一方面似乎懂了點大哥大姐理解的原因，一方面卻又想了解到底調查為何在中國能有如此大的影響。就算是毛澤東寫的東西，也不過就是個調查不是嗎？直到後來讀到毛主義相關著作以及近來的新聞屢屢提到所謂「實事求是」才稍為有一點頭緒。不過調查與「實事求是」乃至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三者連結的強度之高，仍是令人感到疑惑。本研究由如此疑惑出發，試圖藉由釐清調查的來龍去脈來思考到底「實事求是」其背後反映出的脈絡及其對往後造成的影響。惟當進入實際研究後，才發現到這個疑問背後所牽涉到的脈絡遠比一開始的設想來得廣闊許多。

何謂調查？

首先必須先回答一個問題，那就是調查是什麼？關於這一點，教育部國語辭

¹ 李景漢，〈社會調查在今日中國之需要〉，《清華周刊》，38：7、8（北京，1932），頁 1-8。

典修訂本給的回答是：「為了解實況所做的考察」。²一般涵義來說是意旨為某些特別目的，對於細節或資料所進行的考察、檢視。乍看之下十分簡明，且若單就字面來說其所進行的行為並非有何特殊之處。不過當我們將時代拉回所謂近代調查引入的清末，會發現到實際上的進行似乎並不如字面般單純。以最早開始提倡調查的留日學生群體組織的浙江同鄉會調查部（1902年）所推出的〈浙江同鄉會調查部敘例〉來說：

孫子有言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諒哉言乎。今我國一般志士殫精竭慮於歐學，研究其政治、法律、教育、軍事、實業；考察其山川文物風俗人情，將移植其花以為吾國莊嚴。…新舊過渡時代於舊所素有者未能條分縷晰洞窺癥結，則改革之際情形勿悉亂絲焚如何自而理。…

外人之於國也，有政府之調查會，有民間之調查會，大凡一團體之中苟其事於權力，界有直接間接之關係者靡不有調查會。甚且調查一事不惜集數多之人力，糜浩大之款項，費濡滯之時日，彼之視調查蓋如是其亟也。故一國之中上自朝政下逮民俗，舉凡興一利剔一弊皆先有所根據…重以報紙之發達，事靡不載載靡不詳迺至竈養廝卒亦未嘗不手一紙目數行於茶前酒後絮絮譚國事，國之暴富驟強，蓋有繇來非偶然也。

故中國不欲改革也，如欲改革則必先於國中一切事務之性質之狀態而一一考察而一一研究，知病之所在而後可下藥知弊之所在而後可興利，否則沾沾焉持外國已成之模範以鑄印吾國，固有合模範者要其不合之處必窒礙難通，毋亦改革之一大缺點，悉若先時預備之為愈邪。³

「調查」除作為國家強盛的基礎外，也有用以改革的好處。浙江同鄉會調查部的

² 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調查」條。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t/gsweb.cgi?ccd=yO111H&o=e0&sec=sec1&op=v&view=0-1>。引用日期：2017年4月13日。

³ 浙江同鄉會，〈浙江同鄉會調查部敘例〉，《譯書匯編》，2：10（出版地不詳，1902），頁105-114。

宗旨更明白寫著「調查全省鉅細事務為將來地方自治之基礎」，調查的綱目則涵蓋歷史、地理、社會、物產、工業、經濟、商業、農務、軍事、教育、政治、刑法、交通機關以及現今大勢等 14 項。面面俱到的同時，也充分體現出要達成其宣稱目標的決心。

就在浙江同鄉會首建調查部後，調查的風氣也開始先自留學生群體進而擴散到民間。⁴與這股在民間興起的風潮相比，官方的腳步雖然沒有在第一時間跟上，但隨著先後的收回利權以及立憲等事項的需求，不數年間官方亦已成為進行調查的大宗。⁵其中，因著立憲成立的憲政編查館在成立之初（1906 年 7 月）即明言其對於調查的重視。憲政編查館辦事章程中即有提到：

至統計一項，所以驗國計盈絀、國勢強弱，參互比較以定施政之方，故宜內考全國之情勢，外覘世界之競爭。此後各部院、各省應就所管之事詳細列表，按期咨送臣館總彙，各表即以推知國家見勢。考各國每年有統計年鑑之刊彙集，各項統計俾人民可以一覽而知。臣館擬俟各項摺輯完備即行仿照辦理。凡此兩大端於憲政為經始之圖於臣館為應盡之務分設編制統計兩局各派局長及科員等分理其事而以提調總司其成。⁶

已然有仿效外國設立統計局處的宣告，隨後即將此化為現實，1906 年 9 月時所上奏疏言更將調查正式的以官方的身分由中央推廣到全國：

飭令各省設立調查局並辦事章程，略稱考察各省事實較之考察外國規制尤為切要。見在臣館職司，編制統計二局亟當預籌京外通力合作辦法以期推行盡利。必使各省分任調查之責，庶幾民宜土俗洞悉靡遺。……

……奉諭朕奉懿旨，各省民情風俗及一切沿革習尚參差不齊，見在憲政編

⁴ 見李章鵬，〈清末中國現代社會調查肇興芻論〉，《清史研究》，2006：2（北京），頁 76-77，表一、表二、表三。

⁵ 相關的發展可見黃興濤、李章鵬，〈現代統計學的傳入與清末民國社會調查的興起〉，收入黃興濤、夏明方主編，《清末民國社會調查與現代社會科學興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頁 1-46。

⁶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卷 393，〈憲政一〉，頁 11423。

查館開辦編制統計二局，非京外通力合作無以推行盡利。著每省設立調查局一所，由該管督撫遴選委員按照此次奏定章程切實經理。隨時將調查各件咨報該館。至統計一項尤宜由各部院先總其成，著各部院設立統計處由該管堂官派定專員照該館所定表式詳細臚列，按期咨報以備刊行統計年鑑之用。⁷

某種程度上來說可以發現到清廷對此的重視。尤其是隨著統計局的全國開立，其「該管事項按照頒定表式分別填送彙呈考核」的辦法也為其他需要調查的機關提供幫助。當各省統計局開辦後，隨之而來的如 1908 年由商部主持的全國商業調查、民政部的戶口調查、度支部的財政調查等等也於是展開。調查就這樣作為國家轉型的一環進入到中國。⁸

從現代化到正當化

姑且先不論其後的發展，從清末調查發展的討論中，已可見到「調查」作為一個自西方引入的方法或概念，推廣之初背後即具有一股強烈的「救亡圖存」的心態。至於「救亡圖存」的方式便是向西方學習，這也帶出「調查」在研究上的第一個脈絡：亦即對於現代化的討論。雖然光是圍繞在何謂現代化這個命題的討論便不知凡幾，一一敘明似也徒增困擾。以中研院近史所於 1980 年代所出版的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系列來說，其對於現代化的定義簡要來說包含以下幾點：（一）地方政府直接統治人民、（二）政府能有效彌補私人所開辦教育、大眾傳播、交通、社會治安、工業生產等之不足、（三）法治精神的建立、（四）官僚制度的建立、（五）家族主義和地域主義式微，民族思想普及、（六）地方政府不純用武力統治、（七）政治結構分化、（八）政治文化的俗化以及（九）人民對公共事務的大量參與。⁹這個定義雖看似詳細，但僅以方方面面的列舉能否有效解答

⁷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卷 393，〈憲政一〉，頁 11425-11426。

⁸ 牟永如，〈清末社會調查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頁 52-53。

⁹ 張玉法，《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山東省，1860-1916》（臺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所，1982），頁 271。

或仍有待商議。畢竟這些種種的分類對於當時實際操作的官員或體會的百姓都太過遙遠。五四以降傳統與現代的對立，卻也創造出一種對於「現代化」烏托邦的想像。也就在這樣的狀況下，國家對於現代化合法性的追求成為一個 20 世紀以降相當重要的目標。國家權力隨著現代化的追求不斷擴增，更精確來說其表現上是雙面的過程：滲透與擴張以及證明滲透與擴張的合法性。科學控制與物質進步的承諾成為中國政府權力增長中的核心因素。¹⁰

作為輔助國家權力滲透與擴張的調查，也成為新式知識分子用以建構學科本土化的工具。在這個脈絡下，關注的重點在於從國外傳入的社會科學如何透過對中國資料的蒐集建構屬於自身的論述。¹¹不過 Tom Lam 於 2011 年出版的 *A Passion for Facts* 則在這種論述外為調查找到了一個新的定位。將調查與現代國家的建構連結，並進一步上升到全球殖民化的討論之中。¹²該書一經出版，便受到學界多數的高度肯定。雖說在某些部分來說亦被批評為資料不足以支撐論點或更有過度演繹的狀況。但整體來說自本書一出，調查作為現代性展現的一環似也無甚爭議。¹³

當然，除以研究來證明調查與現代性的連結外，回到史料我們也可以看到這股趨勢。辛亥革命的成功雖然象徵清廷轉型的努力付諸流水，自民國以來一連串的問題卻似乎也代表排滿革命並非救亡圖存的最佳解。1919 年的五四運動由此出發，成為新一波改革浪潮的起點。不過，雖然對於如何改良看似有許多的打算，實際上卻是不甚理想。1919 年 11 月 1 日《新社會》中的〈社會調查問題〉，譯介

¹⁰ 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 著，王憲明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 85-86。

¹¹ 黃興濤、夏明方主編，《清末民國社會調查與現代社會科學興起》；Yung-chen Chiang, *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19-194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¹² Tong Lam, *A Passion for Facts: Social Survey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State, 1900-194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¹³ 可參見 Guobin Yang, "A Passion for Facts: Social Survey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1900-1949 by Tong La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19, No. 3 (November 2013), pp. 861-862. Fa-ti Fan, "A Passion for Facts: Social Survey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1900-1949 by Tong La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2, No. 2 (May 2013), pp. 452-453, Wennan Liu, "A Passion for Facts: Social Survey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1900-1949 by Tong Lam,"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24, No. 4 (December 2013), pp. 913-916, 江勇振，〈Tong Lam, A Passion for Facts: Social Survey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1900-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9（臺北，2013），頁 173-199。

者便有意針對此種現象借題發揮：

這篇是俄國托爾斯泰在一千八百八十二年所做的，原名本叫做『莫斯科調查問題』。因為他那裏頭雖然是就莫斯科社會方面的調查立論的，可是所講的都是對於一般社會調查的理論。所以我把能改作這個名字，希望那有志於『社會調查』和『社會改良』的人讀了這篇，有所取法；那就是譯者介紹這篇的意思了。

中國各樣事業都沒有著手舉辦，那『社會調查』的事業更是提不到的了。不過要改革社會，一定先要知道社會的病狀在甚麼地方，然後纔可以去下手救治。用甚麼法子可以才可以知道社會的病狀呢？那非從事調查不可。據這篇上說莫斯科有二千個青年，做那調查的功夫。諸位看看，這樣偉大的事業是容易辦的呢！可是那些鼓吹『解放』和『改造』的人，天天說社會怎樣怎樣的不好，應當怎樣怎樣的改造。試問他們果曾自己下過那切實調查的工夫，曾發見社會的病狀麼？他們也不過是仰著天說笨話，關在自己的屋子裡，做一二篇幾千幾萬字的洋洋大文，來出出風頭罷了。我說這話，並不是看不起那些純潔的青年，實在是希望他們能夠『少說空話，多做實事』在社會上下一番切實調查的工夫。我敢說那效果一定比說空話的大得多呢，這不過是我翻譯這篇時的感觸，隨便在這裏說說罷了。¹⁴

1919 年的五四所帶動的，除因發現到國家仍然衰弱而欲有所變革外，另一方面便是對於「西方」現代性的價值產生疑問。不過即便如此，五四口號中對德先生與賽先生的追求卻並未消失，以科學理性之名建構的「正當化」成為體現「現代性」的憑證。不過，1917 革命成功後的俄國卻也提供新一套的救國方式：革命。其不但透過思想傳播，當時在國際孤立的蘇聯更是透過向外輸出革命，意圖打破被孤立的狀態。在中國，則是找上當時在廣州的孫文。失利的國民黨得以透過聯

¹⁴ 托爾斯泰著，耿匡譯，〈社會調查問題（未完）〉，《新社會》，1919：1（出版地不詳，1991），頁 4-5。。

俄聯共取得一線生機，蘇聯式的革命也找到其發展的根基。要討論中國共產黨的調查，在現代性之外第二條脈絡便是所謂的革命傳統。



竊取與運用

所謂革命傳統看似模糊，攤開來說便會發現其中奧妙。如果說「現代化」或近代化所反映的其實是蘊藏著西方中心觀點的世界觀。其建構從文明到野蠻的分野，並提供一套循序漸進的方案供後進國家「參考」。蘇聯式的革命則提供另外一個新的判準，其以階段論社會的進展，將過去的「現代性」視為社會進化中的一個環節而非終點。更重要的是，「革命」透過階級剝削的視角建構出一種與過往不同的看世界的方式。¹⁵這樣的標準與世界觀在引進中國時卻也遇到在觀念接受與傳播的障礙。「問題」與「主義」之間孰輕孰重，便成為革命進入中國後首先面臨的概念上的挑戰。不過這個問題在當下並未得到解決，得到擱置。¹⁶

國民黨的聯俄聯共使得革命所宣稱的概念透過另外的方式引進到中國，不論是孫中山的「國民革命」論或是陳獨秀因應聯俄聯共所提出的〈資產階級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兩黨之間因合作所產生的各式交流。也促使即便當兩黨走向分裂，所爭論的問題卻不再是所謂的問題與主義，而是運用各式不同的判準來問在共產黨視野下所提出的問題。從社會性質論戰開始，一路經社會史論戰進到中國農村性質論戰。¹⁷其後續的結果，反倒是透過實際進入農村進行調查，促成如《定縣調查報告》的誕生。某種程度上來說，似乎真理的確也因此愈辯愈明。不過即便學術界運用革命的語調作為論爭的依據，實際的操作上受限於經費等因素，終究無法將之運用到進一步的工作。對實際從事革命者而言，相較學術上對於中國社會看法的分歧，其更重要的使命在於確保本

¹⁵ Tucker, Robert C. *Stalin in Power: The Revolution from Above, 1928-1941* (New York : Norton 1992) .

¹⁶ 參王遠義，〈惑在哪裡—新解胡適與李大釗「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及其歷史意義〉，《臺大歷史學報》，50（臺北，2012），頁 155-250。

¹⁷ 盧毅，〈論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4：4（徐州，2008），頁 99-105。

身工作的正當性。換言之，其運用的「調查」與其說是試圖掌握客觀標準，更趨近於建構出不得不革命這樣的事實。

尤其是對一般人來說，隨著「調查」所聯想到的是其背後帶有的近代化、科學、理性等意象。順著對於現代化正當性的追求，則調查也為革命的正當性提供保證。更進一步說，馬克思列寧主義本身在引進當下即宣稱其係「科學」。對於一般百姓來說，也不會特意將現代性或革命分離，遑論兩者都是透過科學理性來建構自身的正當性。雖然兩者的終點有著極大的不同，卻是多數人沒有預想到的。尤其當「調查」成為毛澤東思想重要一環後，調查研究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宏大敘事內部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時。回頭思考調查在現代化進程中所扮演的作用，往往容易使問題從單純學術的探討轉變為對革命的質疑。

導言至此，可以發現對於「調查」的思考，似乎已然透過上述兩個脈絡在各層面的梳理形成一套足以對橫跨 1900 到 1949 乃至 2017 年的中國調查文化的形成與發展的充分解釋。¹⁸不過若是中國「實事求是」的調研文化真是如此順利，又為何會產生大躍進這種規模的災難？過往論述者或將之歸因於毛澤東個人晚期愈趨偏激的思考、革命並未完全成功乃至陰謀論式的討論等等許多理由，卻似乎總難讓人感到信服。¹⁹也因此，若要探究中國共產黨的調查文化，單單試圖就「現代性」、「革命」兩個主旋律嘗試突破，往往會陷入挑戰已能自我圓滿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邏輯而難有成效。或者試圖藉由探究共產黨革命的源頭與動機，透過認知其「陰謀」否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敘事邏輯。只是說當否定中國共產黨敘事邏輯後，研究成果本身卻缺乏進一步探討的可能，因此未能從根本挑戰這樣的敘事邏輯。

¹⁸ 例如羅平漢，《中國共產黨農村調查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范偉達、王競、范冰編著，《中國社會調查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¹⁹ 如陳逸達，〈暴風驟雨：中共東北土地改革 1945-1948〉（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突圍與發現



本文於是嘗試從另外一種可能切入，不就既有邏輯或脈絡本身挑戰，而是透過邏輯或脈絡的執行者來尋找突破的可能。我們承認以年輕世代為主的共產黨員或許的確因熱情而能長期保持對革命事業的忠貞，長征更是一道考驗的關卡。²⁰但是長征後，隨著延安根據地的逐漸穩固，黨內科層體制也相應的隨著解放區擴大而發展。革命隊伍的擴大，多半也會帶來對既有紀律的衝擊。同樣的我們也可以發現此時段同時是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關鍵期，延安整風為我們提供革命與科層互動的切入點，突破也從此開始。過往透過「調查」所揭示的革命與現代性結合，當其成為科層用以執行革命的工具時，其運用的方式以及所造成的後果則為進一步破解現代性與革命連帶提供可能。²¹當由下而上看到的切入點愈來愈多，過往看似邏輯圓滿的宏大敘事也就一去不返。在 Tong Lam 的描述中「對於事實的熱情」之主要目的，在於透過這樣的手段建構出近代國家。那進一步要問的是，共產黨的調查文化是否也達成這樣的效果？馬克思主義是否真的是透過「實事求是」的調查才得以在中國落地生根？「調查研究」在其中到底扮演的是一個實際的過程抑或只是人們用以推託的口實？這些疑問都是本文所意圖回答的問題。

要解答這個問題，本文順著「調查研究」的建立與使用，透過三個章節的鋪陳為疑問找出解答。第一章從「調查」的起源開始，就田野出發，以尋烏人所見的尋烏與毛澤東論述中的尋烏相比較。以此質問現代化與革命現代化兩者間難道真的如過往所宣稱般相呼應？調查帶來的正當化，是真的解決當地民眾的問題還是說只是圓滿共產黨本身的需求？第二三章則探討調查運用的模式，其是如何建構所需的正當性：第二章透過延安時期毛澤東在黨內建構自身路線的過程，點出調查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路線的正當性透過調查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連

²⁰ 莫里斯·邁斯納 (Maurice Meisner) 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頁 31-52。

²¹ 有關科層的討論，最經典的研究當屬 Marx Weber 對官僚化的定義及討論，可參施路赫特 (Wolfgang Schluchter) 著，顧忠華譯，《理性化與官僚化：對韋伯之研究與詮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

結獲得確保，並進一步在整風之時推行成為黨內的文化。這種利用調查建構的正當性隨著整風被科層學習，第三章的晉綏土改便是透過將地方視角或是做為執行者的科層等元素的納入，藉此一探調查如何在政策不斷的變動中發揮提供正當性的角色。

藉由「調查」建構的正當性看似因其科學化的一面而為人所信服，卻往往忽略了資料係由問題而產生。若僅將重點放在地方資料的正確與否，反倒是將更為重要的「問題擬定」這個面向棄置於一旁。如果說正因為能夠解決問題才正當共產黨的統治，但如果解決的問題其實並非地方的問題卻又該如何思考？以發現問題、調查到解決問題這樣的流程展開來說，僅僅思考調查本身只怕難以突破既有敘事邏輯。要向上追溯問題從何而來，最好的方式或許便是回到原點。本文的第一章也就是要順著這樣的方式，從農民運動講習所開始，一路向下探索中國共產黨「調查研究」的起點：《尋鄔調查》。

第二章 《尋鄔調查》的兩條足跡

第二是開調查會。東張西望，道聽塗說，決然得不到什麼完全的知識。我用開調查會的方法得來的材料…尋鄔調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級幹部，一部分下級幹部，一個窮秀才，一個破產了的商會會長，一個在知縣衙門管錢糧的已經失了業的小官吏。他們都給了我很多聞所未聞的知識。²²

毛澤東，〈序言二〉《農村調查文集》，1941/3/17

「你對於那個問題不能解決嗎？那麼，你就去調查那個問題的現狀和它的歷史吧！你完完全全調查明白了，你對那個問題就有解決的辦法了。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²³這是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毛澤東對於調查的用處的見解。單就句中文字來看，毛澤東的觀點其實並無特殊之處。其言論的根基是來自於對科學以及理性的信仰，這一點與許多五四後興起的改良派人士並無他異。但考慮到共產黨意識形態的特殊之處，其言論似乎不能單單如此看待。以毛澤東來說，與《反對本本主義》同時間所做出的《尋鄔調查》是支撐這個論斷的最大後援。調查本身來說整體看來面面俱到，也對當時共產黨所關注的問題有所回應，就這點來看毛澤東可謂言之有據。惟當我們將視野拉近，將調查放回尋烏這塊地方，進一步的問題便是：共產黨提的問題會是地方關注的問題嗎？地方與黨兩方對於問題的界定與改良的方式會是一樣的嗎？要回答這個疑問前，或許還要從《尋鄔調查》出發一探究竟。

1930 年待在尋烏的毛澤東，在黨的地位說不上邊緣但也亦非核心。以當時主要為留學歸國者掌握的黨中央來說，以毛的資歷短時間內看似沒有成為領導者的可能。要說《反對本本主義》或是《尋鄔調查》中的文字是其對於中國革命的未來規劃，可能稍嫌早了一點。直到 1935 年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在黨中地位高

²² 毛澤東，〈『農村調查』序言〉，收入竹內實監修，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毛澤東集》，7（東京：北望社，1971），頁 289-292。

²³ 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頁 1。

升，其對調查的看法在延安整風後隨之成為黨乃至 1949 年後中國的指導路線。爾後追述中國共產黨的調查文化時，多半以《反對本本主義》開始論述。²⁴對於其底氣來源的《尋鄔調查》的瞭解，卻由於其公布較晚，導致研究上的比重相對不如。

25

當《尋鄔調查》出現在世人面前後，與其相關的論述大體而論仍是以黨史的脈絡出發。在黨史之外，《尋鄔調查》本身作為史料的價值也逐漸構成有別與黨史論述的新方向。即以前者來說，2012 年一篇〈關於毛澤東《尋鄔調查》的研究述評〉，直接提到「查閱了近三十年的圖書資料和學術期刊，發現專門研究《尋鄔調查》的著作和期刊論文較少。」²⁶事實上也正如其言，畢竟以黨史的脈絡，提《尋鄔調查》多半是放在毛澤東調查思想內。毛澤東調查思想提《反對本本主義》卻更為直接。雖說近年來由於習近平於 2011 發表過有關《尋鄔調查》的談話，是故對於文本的研究相應的有所增加。²⁷不過，卻仍然還是回到黨的路線、思想上去談，相關的看法與對於調查的定位並未突破過往研究所設定的範疇。²⁸

《尋鄔調查》作為史料的另一面自公開以來卻屢有不同的運用，尤其是 1990 年被譯成英文後，其運用的廣度與範疇更是增加不少。有透過其中描述商業及交通論述贛閩粵邊區交通、人口流動變遷者；有用其中資訊談鄉村權力變化者；更有

²⁴ 羅平漢，《中國共產黨農村調查史》，便直接以「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作為標題作為毛澤東蘇區時代調查的總提要。

²⁵ 基本上對於毛澤東此篇文章的公開，一般來說是同意其為 1982 年透過《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才正式公開。此前則先是於長征時失落，到 50 年代才重新發現，並於 1961 年出現在高級黨校中共黨史教研室的內部資料，但並未公開。劉意，〈關於毛澤東《尋鄔調查》的研究述評〉，《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3（成都，2012），頁 7-11、高級黨校中共黨史教研室編，《毛澤東農村調查》，〈說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出版說明〉。至於更詳細的背景可參考《尋鄔調查》英文本譯者 Roger R. Thompson 所寫的序 *ZeDong Mao, Report from Xunwu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Roger R. Thomps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²⁶ 劉意，〈關於毛澤東《尋鄔調查》的研究述評〉，頁 7。

²⁷ 尋鄔調查紀念館編，〈習近平同志談尋鄔調查〉（習近平原題〈談談調查研究〉）《尋鄔調查史料選編》（尋鄔調查紀念館，江西）。

²⁸ 可參如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編研部編，《尋鄔調查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步》（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尋鄔調查紀念館編，《紀念毛澤東尋鄔調查 85 周年論文集》（江西：尋鄔調查紀念館，2015）等論文集，其中針對尋鄔調查的看法圍繞在馬克斯主義中國化、調查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實事求是精神等主要面。

直接引述作為地方志民國時代材料者。²⁹這些將《尋鄔調查》當作史料使用的著作與黨史脈絡相較下，多半因選題而避開與〈反對本本主義〉等相連接的討論，相形下也因此對於文本本身的限制雖有認識卻較少闡述。

但不論是作為「毛澤東著作」抑或是視為 30 年代農村社會的縮影，針對《尋鄔調查》這份文本本身的討論卻是少見。文本如何產生？調查會提供哪些資訊？諸如此類的問題在欠缺第一手史料的狀況下在今天已難以察覺，後人也只能就毛澤東所留下的文字設法回推。此外亦有透過參與人士的回憶、紀錄等來重建過程，惟由於文本的公開距完成後已有相當時間，直接參與者的回憶僅有一人留存，他所剩者則多半為他人的追記。³⁰若細查文本的內容以及參與人員，從中或可見到一些文本顯性基因的來源。當然遺傳與最終產出兩者自非相同，其間差異就頗值得玩味。本章的目的，即是從這樣的玩味出發，試圖透過組成文本遺傳表現的各方其原點以及邂逅，重建《尋鄔調查》的身世之謎。首先或許還是要從毛澤東談起，循著他走過對於調查實踐與體會的變遷，一探《尋鄔調查》的特異處。

調查與毛澤東的淵源

說到研究農民問題，便感覺太缺乏材料。這種材料的搜集，自然要隨著農民運動的發展，才能日即于豐富。...其中各省農村狀況調查一部分，乃農民運動講習所第六屆學生三百餘人所做...他們以前多沒有農民狀況的詳

²⁹ 游海華，〈清末至民國時期贛閩粵編區市場網絡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6：4（廈門），頁 62-73、王奇生，〈民國時期鄉村權力結構的演變〉，收入周積明、宋德金主編，《中國社會史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下冊，頁 549-590、江西省尋烏縣志編纂委員會，《尋烏縣志》（北京：新華書店，1996）。《尋鄔調查》英文版，ZeDong Mao, *Report from Xunwu*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Roger R. Thompson. Philip C. C. Huang, "Current Research on Ming-Qing and Modern History in China," *Modern China*, Vol. 5, No. 4 (October 1979), 503-523 中有提及此項材料。當英文本出來後，如 Mary S. Erbaugh,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Hakkas: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s a Hakka Enterpris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2 (December 1992), 937-968、Baohui Zhang, "Communal Cooperative Institutions and Peasant Revolutions in South China, 1926-1934,"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9, No. 5 (October 2000), 687-736、John M. Flower, "A Road Is Made: Roads, Temples, and Historical Memory in Ya'an County, Sichua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3, No. 3 (August 2004), 649-685 都有將其作為材料使用，運用上跨足族群（客家）、性別（婦女史）等研究。

³⁰ 劉淑士，〈回憶尋烏調查會情景〉《尋烏調查史料選編》（尋烏調查紀念館，江西）

細的調查，故所述只屬大略。然以前連大略都沒有，今有了一點，便也覺得可貴。我們應該拿了這一點大略，在不久的時期從各地的實際工作實際考察中引出一個詳細的具體的全國的調查來。³¹

毛澤東，〈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1926。

毛澤東的「調查」，在某些觀點中是從其尚在湖南便開始，雖然沒有留下文本，從中獲得的體悟跟經驗對於他日後調查有相當的助益。³²由於沒有留存下的實際文本可以檢視其當時調查的水平以及認識，依材料來看，毛澤東與調查較正式的接觸與認識，怕還是要到農民運動講習所時代才開始。³³毛澤東所留下最早有關農村的調查，便是在此時期所寫的〈中國佃農生活舉例〉。篇幅不長，卻已經可以看到毛澤東對於農民生活的熟悉。內文中大量生活所需的開銷細項，扎扎实實使一個佃農日常所受的痛苦在讀者眼中立體化。待加總後的結果，一股對於佃農生活困苦感嘆很自然的便出現。幾無可能收支平衡的未來，便是淪落成或兵或匪的流離生活，革命之需要不言可喻。³⁴待 1927 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則強調農民本身的自主性以及對於革命與社會改造的正向結果。³⁵從這兩份報告中可以發現到在毛澤東筆下，不論是以數據見長的〈中國佃農生活舉例〉抑或是高度頌揚農民本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都反映出以受高度壓迫卻善良的貧苦農民及貪婪地主二元對立為主體構成對「農村」的「實像」。但民國的農村真的會如此之慘嗎？農民運動的成果又真如毛澤東筆下所描述的如此美好？或許在看這些調查前有必要先將論述形構主體背後的脈絡搞清楚，方能理解形塑這些調查的思考模式。這也意味著必須先回頭把將毛澤東與農村、農民掛在

³¹ 毛澤東，〈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竹內實監修，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毛澤東集》，1(東京：北望社，1972)，頁 175-180。

³² 畢春麗，〈毛澤東調查研究實踐論析〉，《中國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5(山東)，頁 74-77。

³³ 在此以選入《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者為主。

³⁴ 毛澤東，〈中國佃農生活舉例〉，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頁 28-34。

³⁵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竹內實監修，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毛澤東集》，1，頁 207-249。

一起的講習所的目標了解後，才有理解的可能。

1924年，在國共合作下農民首次被納入孫文的革命計畫之中，為將農民納入國民革命，第一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於是在廣東開辦。³⁶其目標是培養能說動農民加入革命的工作員，為此工作員除必須精熟革命基礎的三民主義外，更需要有能說動農民的方法。照孫文的話來說便是「先要使農民明白本身的利益，講農民本身的利益，農民才注意。」且「一般農民全無覺悟，如果地主和農民發生衝突，農民便不能抵抗。我們要免去現在的衝突，要農民將來能夠抵抗，大家此時便要對農民去宣傳，把農民的痛苦講的很清楚，讓一般農民都知道」。³⁷在這樣的計畫中，農民運動的目的其實是要運動農民，將農民納入革命的序列，有需要時更要承擔軍事上的任務。³⁸就如何把農民的痛苦說清楚這一面向中，調查便可說是一好用的工具。畢竟農民的苦痛似乎顯而易見，孫文自己便將中國的農民同帝俄的農奴做對比，就小地主與大地主的經營模式來論，就他看來俄國農奴所受的痛苦是還及不上中國的農夫呢。雖然他亦強調這是他理想上的比較，並希望學生還要去實際調查。不過，當一開始孫文便點明「理想上的比較」，且希望達到的目標是「把農民的痛苦講的很清楚」。這樣調查出來的結果能離開孫文的希望多少，頗值得玩味。同時也必須注意到，這些材料的潛在讀者是實際下鄉宣導的革命者而非農民，文本是做為參考材料存在。光是由革命者拿著編好的材料下鄉向實際農民宣導他們的痛苦，其推動的效果如何只怕有不少可以研究之處。

在如此期望下所成立的農講所，一連開六期。其中所授課程，正如孫文的期待，注重國民黨主義解釋、國民革命基礎知識、農民運動理論及方法、集會結社之實習、宣傳之訓練、軍事訓練以及農民運動見習，並尤重軍事訓練。其中農民

³⁶ 孫中山，〈孫中山先生對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生訓詞〉，收入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資料選編》，頁 122-126；原文見孫文，〈耕者要有其田〉，收入世界知識手冊編輯委員會編，《孫中山選集（下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頁 865-869。

³⁷ 孫中山，〈孫中山先生對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生訓詞〉，收入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資料選編》，頁 122-126。

³⁸ 廖仲愷，〈農民運動所當注意之要點〉，收入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資料選編》，頁 127-132。

運動理論及實習跟宣傳訓練下的課目頗值得注意，農民運動之理論及其實施方略包含農民運動之理論、世界農民運動史略及其現勢、農民協會與自衛軍之組織、農民運動現況及其趨勢、中國農業情形及改良方法、農村教育、合作運動與農村之關係、中國工人運動及工人狀況；關於實習宣傳訓練下，則有統計學、閱書報與造論、演說與集會實習、辯論會、唱歌以及畫圖。³⁹除在理論上強調與世界局勢的連動外，更重要是加強學員進入農村並宣傳的能力。課程中所包含的農民協會、農業改良、農村教育、合作運動等都可說是作為學員進入農村的管道。用理論武裝，配以能改善農村生活的方式滲透，並藉由書報、演說、唱歌、畫圖等技巧宣傳。在妥善的教育外，來上課的學員也往往具備強大的信心與意志。⁴⁰具覺悟之青年配合革命之教育，所得成果自不令人意外。

所招收的人數自第一屆後即開始大漲，到毛澤東做為第六屆所長時，學生已達 327 人之多。農講所的課程基本上大方向不變，細項則每屆不同。以第六屆來說，共有二十五門課授課時數 252 小時，用時最多為毛澤東所講中國農民問題（23 小時），次則為經濟學常識、蘇俄狀況（18 小時），他在 10 小時以上者還有帝國主義（14）、中國政治狀況（12）、中國史概要（10）、中國職工運動（17）、廣東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決議案（15）、農業常識（16）、農村合作概論（10）以及革命畫（14）等，軍事訓練時數則計 128 小時。從授課來看，還是以理論佔多數，此外尚有實習以及課外的閱讀以及研究會，理論上來說應是建立對農村的完整認識。其中最為特別是在毛澤東指導下對於實際農民問題展開的研究，透過組織 13 個由各該省學生組織之農民問題研究會來研究包含租率、利率、田賦、工價、地方政治、團防、農民觀念等等洋洋灑灑 33 個問題的全國性調查。⁴¹這些課

³⁹ 〈第一至五屆農講所總述〉，收入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資料選編》，頁 34-40。

⁴⁰ 第一屆學員中，以五四運動奮鬥經驗而覺悟要入民間去之份子為多；次則為農民以接受本黨政綱而有做農民運動於前者；次則工人曾參加工會組織運動者。〈第一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收入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資料選編》，頁 42。

⁴¹ 〈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辦理經過〉，收入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資料選編》，頁 79-86。

程的講義以及研究會的調查，有相當部分的成果後來都進到《農民問題叢刊》。⁴²

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整理，尤其是毛澤東當所長時所著重的面向中，可以發現到「農村調查」這件事在當時脈絡下所具備的特殊意涵。當農村進入到革命視角後，不論是要農村運動或是運動農村，基本上的意涵都是將農村視為有待「啟蒙」的客體。對革命黨員而言農村、農民缺乏的不只是技術與資金，更重要的是缺乏對於政治的覺悟。也就在這樣的狀態下，所謂對於農村的瞭解其目標當然是以「發現問題」為核心。在這樣的脈絡下再回到毛澤東對於農村所做的調查上，〈中國佃農生活舉例〉其詳細數目，雖應不全係偽造，卻也足以將農村抽離其固有脈絡，透過片面呈現使得問題成形。

相比之下更為有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其重點並不在於陳述農民痛苦，而是講述農民如何參加革命得另一種可能。之所以會引起毛澤東之外眾人的反對，除當時國共兩黨尚未撕破臉外，農民透過農民協會自我管理這樣不合革命理論的事實或也是其中原因之一。雖說理論上農民協會是在受過訓練的革命工作者領導下建立，農民竟然成為農民協會主體自我管理，仍然不可為一般受過革命訓練的革命黨員所相信。⁴³特別是在農民自我管理下的農民協會其行徑的過激之處，尤為城市中的革命黨員所排斥，也加強他們對於農民自我管理是否可行的疑慮。⁴⁴相反的，實際走一遭的毛澤東卻也因為其調查，或說親歷過後的真實，開始跟大部分城市中的黨內同志有稍稍不同的見解。

這樣的認識卻不一定會對其調查的運用造成妨礙，畢竟這樣的認識也僅是將農民在革命的地位及作用上升到與工人同等。原有的問題卻並未消失或解決，只是有待正確的認知將其辨認出來，這個工作卻需要革命者透過「調查」來將之顯

⁴² 〈《農民問題叢刊》簡介〉，收入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資料選編》，頁 168。

⁴³ 1920 年代的安源即係共產黨早期的成功案例，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的運作可為共產黨蘇維埃的典範。其後續雖然失敗，但過往在共產黨員幹部帶領下的自治、罷工等相當程度成為共產黨早期運動的典範。詳參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著，閻小駿譯，《安源：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4)。

⁴⁴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竹內實監修，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毛澤東集》，1，頁 207-249。

現。這一點不論是在井岡山、尋烏、才溪鄉乃至延安都可以見到其演繹的痕跡。但必須注意的是，這些透過革命者發現的問題中有多少是真正屬於地方的問題只怕要先打個問號。



《尋鄔調查》與尋烏的調查

說起《尋鄔調查》的寫作，第一個出現的人名，沒有意外便是毛澤東，若要問更詳細一些，便會提到古柏的協助。正如本章開頭的引文所示：毛澤東寫就《尋鄔調查》所依賴的，終非自身及古柏兩人，是透過調查會的形式，向群眾求教方才寫就。⁴⁵但是尋烏，或說尋鄔卻並非是當毛澤東來過後才被認識。如果說《尋鄔調查》反應毛澤東對此的認識，這樣的認識卻係先基於他人的認識之上產生。易言之，透過調查會所建立的尋烏其基本的根柢其實是尋烏人自身看待尋烏的視角。也就是說要理解毛澤東在《尋鄔調查》的創新或見解，如果沒有搭配與尋烏當地既有認識的比較，產生的結果有很大的可能是有所不足的。雖說這種不足在特定的脈絡下反有一定的助益，對於研究者而言卻多少會導致視角的偏頗。⁴⁶不過即便如此，要完全還原當地人的認識亦有一定的困難。不過所幸毛澤東在調查中有留下協力者的背景，本節希望透過這些協力者的可能觀點來重建毛澤東在寫作、開會時會接受到那些可能資訊。

如果細究毛澤東所列舉人員的來歷，有幾點簡單觀察如下：10 人中有 6 人間或擔任過蘇維埃的職務，最主要的 4 個資訊提供者則有 3 位；年齡分布上未受到科舉影響成長者有 4 位，在民國以前成人者有 5 位，另有 1 人長於新舊教育交雜期；主要的資訊提供者幾乎都為城區人，僅有 2 人住在離城區稍遠的石排下；又 10 人中被評為農民者一半，他則教師 2、學生 1、辦事員 1、商會成員 1，但農民者純然只為農民者僅有 2 人，其他多半曾兼他業。以上幾點觀察所透漏的資訊包含：當資訊提供者多為在共產黨階級成分序列下的受益者，其所提供的觀點

⁴⁵ 毛澤東，〈尋烏調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頁 41-181。

⁴⁶ 即如前述的以毛澤東為核心的脈絡，藉此強調毛澤東本身調查的卓異處。

多少會偏向有利共產黨的解釋；年齡上的序列則可能影響到視野以及關懷，大膽一點說對於問題認識上會有相當差異；出生地當然最直接來說，主要會影響到資訊提供的便利性，以城區為主要並不意外，即便是石牌下在過去其主要進城進鎮也是以尋烏城為主。受訪者主要提供的資訊與見解自不脫尋烏縣城之外，對於其他地方的觀察未必道地；最後職業上可以發現到雖說歸納起來是農民身分為多，實際的情形更多的卻反映出純粹以「職業」來定義身分乃至階級此種邏輯的有限以及不足。雖然此處提這些對於調查會在資料蒐集上因著受訪者成分可能導致與實際上的偏差，卻很難單單以這些論斷來說明他們對於尋烏認識的可能觀點，畢竟沒有文本單靠背景分析來推測並無法成為有效的佐證。

或許透過一些其他材料或許能給予我們與這些受訪者接近的觀點以及視野。透過雖非與毛澤東同時空所留下，卻是以尋烏在京學生為主於 1924 年所創辦的《尋鄔》月刊，一窺在毛澤東之前地方上對於尋烏的認識。之所以選擇這份文本，除因其內容的豐富外，更重要的是這些寫作者都可說是同毛澤東一般受過五四的影響，他們或同第一屆農講所的學生般，有股到民間去「改良」的熱情。雖然在 1924 年的當下並未直接的下去推行理念，卻透過文字將所見的「舊社會」所存的諸多問題點出。其回應讀者的言論，更將此種「改良」的心態表露無遺：

本刊出世後，接了邑中許多讀者的來信，都說是本刊內容，多不合吾邑風俗習慣。余以為吾邑之風俗習慣，好的固有，但大半都是不適於現代人類之生活的。本刊既已改良社會為宗旨，對於不好的舊風俗，舊習慣，當然立於反對的地位，要想出種種的方法來推翻他，破壞他。（對於虛偽的不合時代的舊禮教亦然。）若是怛怛倪倪，事事要服從舊風俗舊習慣之指揮，則吾尋社會，恐終無改良之一日矣！！讀者諸君以為怎樣？⁴⁷

藉由《尋鄔》這份文本，除地方上的認識外，或許更重要的是能發現到同為在五四影響下毛澤東觀點的特異之處。若將《尋鄔》上所載的文章一一評斷或陷

⁴⁷ 芳，〈編輯餘瀋〉，《尋鄔》1:3（北京，1924），頁 31。

於焦點太散之過，且撰稿者的立場往往影響其評斷的標準，是故雖說意圖藉由《尋鄔》來一窺毛澤東對於問題思考與他人不同處，卻仍須可資比較之對象。幸運的是恰好有一立場與毛澤東相近，既於《尋鄔》發表過對於尋烏問題見解，更神奇的也有參加過《尋鄔調查》的劉淑士，雖不能說完美，也相當湊巧的填上這樣的位子。

劉淑士，生於 1891 年，自幼受教於身為秀才的父親劉仲齊，1910 年畢業於縣立高等小學，時年 20。於 1928 年加入共產黨，1930 年參加毛澤東主持的尋烏調查會，也與古柏等人編輯過《尋烏日報》。⁴⁸於 1924 年，33 歲時於《尋鄔》上連載〈尋鄔的八面風〉。據其所言自身之動機，係「據著平日的見聞，順著良心的驅策，公公道道，把尋鄔八面未開的風氣揭發出來，和大家討論一下，或著因此可得著風氣大開的效果，也可未定。」⁴⁹其所指的八面風氣包括：家庭、宗族、城市、法定機關、教育、實業、地方財政以及宗教。為能與毛澤東《尋鄔調查》有效相較，此處以其中有關實業一項為主要探討的焦點。在劉淑士的討論中，實業包含農工礦商四項，除商業外都面臨到種種的問題。農業方面問題有二，一是生產的退步，二是土地只知搶買田產不思開發山林；工業普遍技藝低落，除粗重的竹木器外，盡委外工；礦業則雖有銀、銅，因缺乏資金與技術無以為繼，僅鐵砂一項為出口大宗；不過即便是看似無所長的山區小縣，獨商業一項，凡近尋江諸市都大有發展。邑中人才多入商界，新市開商攤增，卻也導致風俗日漸華奢，他業人力不足的景象。⁵⁰有趣的是，於此同時在《尋鄔》上亦另有兩篇有關尋烏商業的文章，這兩篇文章的作者一在北京一在上海，都對於尋烏的商業提出要改革的呼聲。⁵¹兩人的觀點大同小異，俱強調邑人不重商業知識、商會功能不彰，他則改善交通、重視公司組織、進取志向等。雙方對於尋烏商業的觀察雖有不同，

⁴⁸ 尋烏調查紀念館編，〈當年出席尋烏調查會部分人員生平簡介〉《尋烏調查史料選編》（尋烏調查紀念館，江西）。

⁴⁹ 劉淑士，〈尋鄔的『八面風』〉，《尋鄔》1:6（北京，1924，9）。

⁵⁰ 劉淑士，〈尋鄔的『八面風』（續附表）〉，《尋鄔》2:1（北京，1925）。

⁵¹ 分別是時於上海曾加俊所做的〈改革尋鄔商業的我見〉，《尋鄔》1:3（北京，1924）。以及在北京王維藩的〈振興吾邑商業之芻議〉，《尋鄔》。

立場看似衝突，基本上都是懷著對於家鄉的期盼，希望能夠提出改善的方法。兩方觀點的差別，或即是來自於雙方所處的不同。此處的所處，最直接的來說，在於兩方一在尋鄔，一則寓外；一則已在家鄉從事教職，一則尚為學生，地點與經歷使得他們對於同樣的一件事有著相異的看法。當然，回到尋烏人看待本地商業的觀點，就在地方的角度來或更多的是夾雜於二者之間但傾向於劉淑士一方。至少，作為編給當時在吉潭鎮上知恥小學校教材的《尋鄔鄉土志》，對於商業的看法是「我邑出產物少，舟車不通，故一邑之商務未見發達。惟沿尋江岸有小舟可通貿易，略見繁盛。」⁵²大體呼應劉淑士所言外，對於改善商業的辦法，亦不過強實業以利出產，闢馬路以廣交通而已。

大方向上是受著五四的影響《尋鄔》這份雜誌中，可以發現到尋烏籍知識分子的努力。其一方面來說是作為五四以降呼招知識分子下鄉改造社會的嘗試體現的一環；又由於其地方性，使我們看到在撰稿者中同時兼有寓居他省留學生以及地方任教的老師。得到的結果，便是在某些議題上的多元呈現，本節所舉的商業即可看到同時有外省學生以及地方教師的不同闡發。當即便尋烏本地人之間的觀點也會因身分、所處乃至教育等有所不同時，又該如何去評判由所謂「外人」所進行的調查呢？說到底，調查的前提在於問題的提出，擬定問題本身即是一門學問。更進一步來說，調查的樣本選擇亦同。且更多的時候，觀察與見解往往先於「調查」。本地與外地，「調查」與猜想的分際可能並不如想像中來的大。在毛澤東《尋鄔調查》以前，由地方人士對於其生長鄉土已有過見解。其中雖然立場各異，觀點不一的原由也可運用到毛澤東的調查之上。到底一個受過五四洗禮，帶著革命觀點卻又某種程度「在地」的「調查」會跟地方原有觀點有哪些歧異？這些歧異到最後又會如何影響《反對本本主義》？這些問題還要留待下一節見分曉。

⁵² 謝竹銘，《尋鄔鄉土志》，1937。

《反對本本主義》的後盾：《尋鄔調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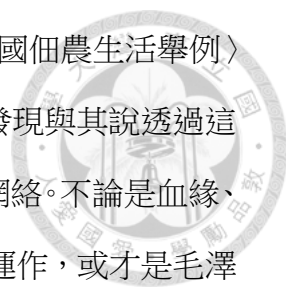
我做的調查以這次為最大規模。…關於中國的富農問題我還沒有全般了解的時候，同時我對於商業狀況是完全的門外漢，因此下大力來做這個調查。

毛澤東，1931/2/2 於寧都小布

透過以上兩節將與《尋鄔調查》有關人士來歷搞清楚後，本節將透過文本來一探究竟，為何有這份調查，毛澤東有辦法接著提出〈反對本本主義〉？他與過去其他共產黨人包含他自己搞的調查有何差異？第一節我們已經看到毛澤東過去調查的經歷以及其背後的所持的概念，上一節我們則看到尋烏人對於自身問題的不同看法。回到文本上，則毛澤東在 1931 年回顧時點出他當時的目標，是就意圖解富農以及商業狀況這兩個問題。優點是由於尋烏的地點故只要明白這個縣，則閩粵贛三省交界的縣應該都不會差太多，缺點則是沒有分析中農、雇農以及流氓，舊有土地分配上亦未將不同階層的農民土地分開講。⁵³總體來說，毛澤東寫作時文分五章：政治區劃、交通、商業、舊有土地關係以及土地鬥爭。第一二兩章是基本的概念，呼應前者所提到的昨為三省交界線的有利位置以及其商業條件構成的重點。第三章則處理有關商業的問題。第四章談富農，第五章則談紅軍來到後的成果。

就構成來說與過去相比，最為突出的自然是對於商業的考察。商業部分在全文 80,000 多字中的占近 15,000 字，卻不到兩成。蓋尋烏縣城本非縣內主要市場，城不大，商家也不過 3、40 家。按毛澤東的說法其會選擇此地是因為機緣湊巧，苛責說搞錯市場做調查自難對整體的商業有所理解並沒有太大意義。回到文本，毛澤東主張是要將尋烏縣城作為一研究城市問題的人門。根本來說尋烏縣城主要是以政治的涵義構成，商業市場的規模頂多構得上是近鄰四廂農產品的交易點。文本中也坦承到，尋烏城還是一農業手工業城市。如此說要解城市問題，則定義

⁵³ 毛澤東，〈尋烏調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頁 41。



本身也就無比重要。雖然因著要解「城市」的生計問題故與〈中國佃農生活舉例〉一般一樣有著大量的數字以及細節，不過細查毛澤東的文字，會發現與其說透過這部分他想要理解城市的生計問題，不如說是探明城市中的各式網絡。不論是血緣、政治、商業乃至出身都與農村有著相當不一樣，其如何構成並運作，或才是毛澤東他調查的所得。更為直接地說，毛澤東在其所謂商業部分的調查，說要能解決不論是所謂城市的商業資產階級或貧民問題都可以說有相當難度。第二個是由於所謂如娼妓、遊民等基本上在此時可說便是發現其失業的原由，除讓其離開城市或著強制轉業外並無良方。第一個問題所問的「商業資產階級」卻是個大麻煩，因為綜觀尋烏縣城，即便他是一個農業為主手工業為副，農業人口佔全縣 6 成，既然定義上屬於「城市」，卻不見有所謂的「商業資產階級」存在。雖然毛澤東是用尋烏縣城不但商業少且逐年衰弱來辯護，只是也草草結束這個篇章，迅速地往其更為擅長的土地出發。商業一章的結尾即是以十二個收租的地主收尾，為下一章的舊有土地關係拉開序幕。

當我們回頭與之前在尋烏的調查做比較，會發現到雖然都以商業為題，雙方所關心的層級卻有相當的差異。尋烏本地人雖亦有問題關懷的差別，對他們來說，核心在於問題的改進，且或許更為重要的是，沒有人會將尋烏縣城作為研究商業的重點。就算是以所謂對「城市」的看法，劉淑士的切入是對於城市所蘊藏的諸多問題：賭博、煙館、建醮、演戲乃至迎神賽會，毛澤東關注的卻是誰能話事、地方上的物產進出等。⁵⁴當然可以說畢竟雙方所佔的位置不同，所以關心的焦點會有相當的差異。更進一步則是思考寫作的目的、動機乃至讀者的差異。或許更為根本的，是雙方概念上的歧異。以「階級」作為思考原點的脈絡，造就對於問題思考出發點的不同，隨之的解釋與終點也自然的相去甚遠。不過在此或許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解決，的確毛澤東所關注的問題由於其脈絡導致會跟尋烏當地原有的觀察有段距離，他的問題卻是符合於當時中國共產黨的語言脈絡，只是說到達

⁵⁴ 劉淑士，〈尋鄔的八面風（續）〉《尋鄔》2:2（北京：19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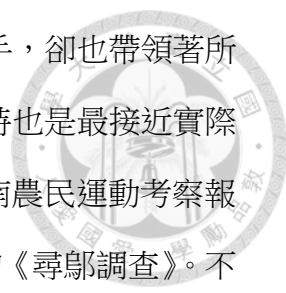
的終點似乎有點超出預想。但是兩方問題的歧異性也由此可見。

但當我們深入比較兩者異同時，從「階級」這一點出發可以發現更重要的可能是毛澤東如何透過階級重新塑造出地方社會網絡。在《尋鄔調查》中，毛澤東第四章的〈尋鄔的舊有土地關係〉一節中雖然看似強調的是過去尋烏土地分配的不均以及其所帶來的剝削。細看之下卻可以發現其實透過所謂對「大地主」、「中地主」到「小地主」的分析其實更趨近於對於當時尋烏縣內上層結構的理解。以所佔地之多寡為分類並分析的結果，則清末以來透過新學、從軍等上升，所謂「新尋派」也同樣被以「中地主」視之。進一步來說，雖然在「中地主」中分出「新」、「半新不舊」以及「全舊」三項，看似是更細緻分析的同時卻實際上仍是將這些人視作一概要打倒的對象。而更為有趣的是所謂「小地主」階級，由於當時尋烏與共產黨合作的平民合作社成員多半出於此，是故在描述時強調的是這些小地主如何受到中大地主聯合剝削的一面。不過卻對同屬「小地主」階級的新發戶大加貶抑，指稱這些「半地主性的富農」是農村中最惡劣的敵人階級。如此，以「地主」建構對尋烏地方的權力網絡認識，是否合宜恐怕還有待商榷。⁵⁵

更別提即便尋烏縣所謂的大地主基本來說所佔有的土地其實多半應該認識為該族所擁有，由於尋烏縣內的聚落多半都是以一個山坳一個單姓村構成，調查中所謂大地主所佔有的多半往往就是指其族眾所佔有的山坳。最直接來說，以謝杰為例，其族所在乃是距南八區政治中心牛斗光一段距離的羅陂，在牛斗光不見謝家蹤跡。謝家能夠翻身，主要係依靠謝杰從軍，並依靠其當師長時所建立的關係同澄江謝家拉上線，從而得以於 1920 到 1930 年代成為縣上領導之一。但卻由於其身分而被劃入大地主。反過來說，同為坵坊地方一族中的劉作瑞卻因為與本家劉俊福相爭不過，參加革命，其侄劉國鄉得作區蘇委。由此來看，調查所構築出社會結構的到底有多少能被地方人士接受？只怕有待商榷。

不過，對於問題思考的歧異在脫離地方後就喪失了質問的用處。回到寫作當

⁵⁵ 毛澤東，〈尋烏調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頁 41-1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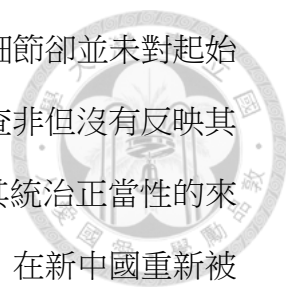


下，1930年5月當下的毛澤東雖然在黨內地位仍稱不上頭把手，卻也帶領著所剩無幾工農紅軍中的其中一支。沒有留過學，學歷一般，卻同時也是最接近實際中國的他。雖然前有彭湃《海豐農民運動》，毛澤東亦有〈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此外更進一步的是，他現在還有一部包含城市商業部分的《尋鄔調查》。不但身在第一線，也有作品背書，說起《調查工作》確實沒有人能比毛澤東更有底氣。更別說某種程度上來講，其中的許多詞句「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那麼，它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便是盲動主義」、「社會經濟調查，是為得到正確的階級估量，接著定出正確的鬥爭策略」能由《尋鄔調查》找到例證，或也相當程度反應對於時在上海黨中央的一股牢騷。

小 結

本章係透過《反對本本主義》背後的《尋鄔調查》的來由，試圖回答以下這個問題：毛澤東過往也做過許多調查，為何要到《尋鄔調查》才能提出《反對本本主義》？從這個疑問開始延伸出的，便是在本章開頭提過的玩味，亦即《尋鄔調查》的特殊性。這個特殊性從何而來？又為何而來？本章藉由梳理《尋鄔調查》中所呈現的內容，回溯毛澤東以及尋烏地方上的協助者的由來與其後產生的化學效應，來回答以上的提問。當然也有另一種作法，便是比較《尋鄔調查》與過往毛澤東所做的調查如《湖南農民運動調查》、《中國佃農生活舉例》相互比較，從中提出這些文本的差異及繼承。這種過度著重毛澤東本身的做法往往會因此落入官方宣傳的泥淖，忽略其調查的客體，多半僅能見到籠罩在毛澤東巨大光輝下的論述。如何避開過往窠臼，將毛澤東調查過往強調的特殊性與較少提到，實際上可能在當下更為重要的一般性結合，或才是理解其調查及論述的有效手段。

以運動農民為目的開展出的農村調查與共產黨意識形態兩者的結合，基本上已然為《尋鄔調查》定調：其目的並非要解決實際於尋烏這塊地方的問題，而是要透過調查的行為建構共產黨本身在地方上的正當性。其建構的方式是來自於回



應並解決共產黨自身所提出的問題，調查雖然提供許多地方的細節卻並未對起始提出的問題有所挑戰。對於研究對象的尋烏來說，共產黨的調查非但沒有反映其所關注的問題，共產黨表面上對於地方問題的解決卻又成為其統治正當性的來源。這種說不出的矛盾只怕也是有口難言，尤其當《尋鄔調查》在新中國重新被公布時更是如此。不論是作為研究的材料或是毛澤東理論的依據，地方原本的聲音已經沒有人能夠聽到了。不過在此之前必須注意到，1930 年的調查並沒有在當下或是新中國成立前發生任何效用，調查研究卻還是成為共產黨日後所強調的重要精神，如何辦到還要透過下一章深入延安整風來一探究竟。

第三章 由外而內：作為政治文化的共產黨調查

1935年1月，長征途中的中國共產黨於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前於1931年第六屆四中全會中被驅離黨中央決策的毛澤東，在此時重新回到黨的中央，並恢復對於工農紅軍的指揮權。當長征隨著抵達延安結束後，毛澤東於黨中的地位以及黨員心中的地位都達到一個新的高度，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也以此為所謂「毛主義」的起點。⁵⁶雖說甫至延安伊始局勢尚未明朗，惟隨著西安事變、抗戰爆發等外因，共產黨在延安的事實逐漸安定。黨的內部雖先後有張國濤及王明等人的挑戰，當毛澤東透過整風於黨內建立一元統治的同時，其對於共產主義的詮釋也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正統路線。⁵⁷即便諸如《調查工作》、《尋鄔調查》等在長征中散失，毛澤東對於調查研究的見解仍是作為幹部的教材成為黨對於調查研究的基本看法。⁵⁸過往在研究中國近代「調查」文化時，多半也以此為開端，為此時期的整體調查文化發展定調。其定調的方式往往透過調查的數量、有關調查的宣示等佐證調查文化的勃興，卻難以解釋這些表象產生背後的動因。調查為何及如何做為一種到今天仍然影響中國共產黨的文化，或許需要有從表象以外入手的別種途徑。更直接來說，如果1930年的毛澤東已然有一套對於調查研究的宏大思考，為何要拖到延安整風時「調查研究」才被重新提出？是在如何的脈絡下，調查研究才進入中國共產黨呢？

國共的異與同：話語權的運用與選擇

在進入共產黨的語境前，不妨先來看看國民黨的狀況。1927年的分共造成

⁵⁶ 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頁31-52。邁斯納特別強調長征對於共產黨員精神上的淬鍊，而帶領他們的毛澤東的地位在這些倖存者中被賦予神聖性。所謂「毛主義」便是建立在這樣的精神上，也因此有著強烈的唯意識論的味道。

⁵⁷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上冊，頁368-400。

⁵⁸ 毛澤東，〈『農村調查』序言一〉1937/10/6，竹內實監修，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毛澤東集》，5（東京：北望社，1971），頁275-276。

國民黨與共產黨兩個革命政黨就此分道揚鑣，雖說就後見之明來看，兩黨並非就此不相往來，可以確定的是雙方的立場即便因著抗日勉為其難合作時，仍有著天壤之別。最直接的來說，北伐成功後根據孫文《建國大綱》規劃進入訓政時期的國民黨，雖說根據理論仍然處於革命階段，實質上其身分已轉為執政者，其思考的角度已然與過去革命時期有所不同。

以訓政時期國民政府的調查來看，可說有兩個方向：根據《建國大綱》中對於訓政階段籌辦地方自治的要求所推行的調查以及隨著先後剿共、抗戰需求所發展的調查。兩者偏重所異或可簡略的說前者重點在於社會本身，其調查是以改革現有社會為出發；後者卻以資源本身為考量，重點在於取得資源及分配兩項，能求效益之最大化。儘管出發點不同，實際操作上卻無法如此的截然二分，求社會改良還是要理解社會本身的限制；獲取資源之最大化也不妨礙將擋路的舊勢力剷除。根本來說其最終的目的在於近代國家體制的建構，照蔣介石本身的說法，便是國家要有能負擔「總體戰」的能耐。⁵⁹即便如此，其實踐與期望卻仍是有著不小的落差。以「大歷史」聞名的黃仁宇，其思想根源部份便是來自從軍時的經驗。國民政府的政府，照他的看法：

國民黨對統治的心態，具體呈現了中國傳統的政治手腕。我們必須了解到，古代的皇帝無從知悉所統治百姓的數目，不清楚實際稅收，也無從掌握軍隊的確切人數。統計數字不過是粗略的估算，其準確度有多高，官員也不會太當真。在這種情況下，將所有公共事務都轉變成數字，再進行處理，是很不切實際的。...國民黨的難題是，他打算在 20 世紀再重複這個過程，但中國的地位今非昔比，缺陷也無處可隱藏。將所有事物一一測試後，沒多久我就覺得理想破滅。⁶⁰

提出中國便是因為欠缺數字化的管理以致難以進入資本主義的世界，導致中國逐

⁵⁹ 張智璋，〈蔣介石與現代國家的建構：以 1930 年代江西的地方政制改革為例〉，《政大史粹》，28（臺北，2015），頁 1-37

⁶⁰ 黃仁宇著，張逸安譯，《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頁 5。

漸落後於西方國家。⁶¹這個說法引起的爭議以及隨之的討論，到 2016 年時已然在諸多研究的挑戰下顯示出問題本身的侷限。⁶²不過從黃仁宇作為親歷者的這個角度出發，或也可反映出官方想像中「近代國家」與人民的距離。要直接說民國時期國民政府的作為不具意義或也太過，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等研究者即提出中國轉型成近代國家的進程中，國民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在於建構一近代化的上層政府體制。⁶³

近年研究者則設法突破以往認識的侷限，透過實際的地方案例思考過往論述的不足，其主要的突破點則集中在國民黨實際掌握且著力較深的江西作為代表。⁶⁴先不論這些研究是否已能從根本突破過去對於國民黨下沉能力不足的論點，就討論的視角而言或許在時空間上較能與共產黨相提並論。不過有關國民黨或說國民政府時期的調查，數量龐大，種類繁多，光就量的評比上就較之局處一地的共產黨不可同日而語。更遑論在這樣數量之外，國民黨時代進行調查的主體從中央上層的資源委員會到地方上為推行新縣制、保甲等地方自治措施先期成立的調查機構不一而足。即便其所得出的成果並非盡如人意，要說國民黨不重視調查，只怕有待討論。⁶⁵

在延安的共產黨要處理的問題在相當程度上是江西時期的延續，調查基本仍是為革命服務，同時因著時局改易必須開始注重根據地本身建設、抗日口號下妥協的不同群體應對以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建設等因素。是故雖然調查的方式、理論不會脫離過去的習慣，實際運作上卻無法如以往強力。其時的調查，就某方面來說重點反更可能不在於資訊的獲取而是在於進行調查者本身的建構。更確切的來說，延安時期共產黨有關調查研究的相關文件從 1941 年 3 月毛澤東為其《農

⁶¹ 黃仁宇，《大歷史不會萎縮》（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頁 79-136。

⁶² 最直接的來說或是對於西歐式的資本主義社會到底能不能套用到全世界的疑問。

⁶³ 請參照杜贊奇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 年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⁶⁴ 例如張智璋，〈蔣介石與現代國家的建構：以 1930 年代江西的地方政制改革為例〉，頁 1-37。

⁶⁵ 對國民政府時期的調查，或可參見任偉偉，〈南京國民政府社會調查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12）。

村調查》所寫的第二版序與跋、5月〈改造我們的學習〉到8月〈中共中央對於調查研究的決定〉、〈關於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其時間的密集值得玩味。要了解這一連串有關調查研究的相關規則，若是不將其與隨後自1942年開始的整風同樣的脈絡便難以釐清其後的意圖。過去對於延安時期調查工作的討論，強調的面向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中心，作調查這樣一個行為被視為毛澤東思想的具體實現。共產黨的調查又往往要連著土地革命一同討論，調查研究被視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土地革命、毛澤東思想三位一體的實現。對於調查的討論，多半不出作為強化中國共產黨執政正當性的佐證。⁶⁶。

換言之，國共兩方的調查的差別以及其遺留會有如此之不同，還是要就外顯出的表象以外部分理解。不論是文本質與量的討論，或是透過檢視兩黨的思想脈絡，以某種程度本質論的方式論斷兩黨調查的差異。如此，上起問題與主義論戰，下訖黨本身的意識形態辯證，旁及兩黨對於調查的主流論述比較，或也是一種思考的途徑。⁶⁷惟此種思想上的驗證已不知凡幾，卻往往在理解兩黨本質不同後少有進一步的突破。

不過，換個角度來說，或許答案還真的不應該單就「黨」的本質思考。如果說從共產黨的例子中我們看到毛澤東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反過來說，那蔣介石又是如何呢？這邊並不是要關注蔣介石有沒有作調查，但毛澤東崛起與中國共產黨調查文化發展高度重合這一條線或許是我們思考兩黨差異時的重要線索。也就是文化形成背後的因素。當背景清楚，進一步才是探討這些意識形態的辯證與思考是如何進到黨員腦袋以及身體上。本章即希冀以此檢視調查文化形成並進入的途徑，思考共產黨調查文化如此殊異的可能來由。

⁶⁶ 羅平漢，《中國共產黨農村調查史》。

⁶⁷ 國民黨基層組織問題可見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上海書店，2010）；問題與主義論爭則可參考王遠義，〈惑在哪裡—新解胡適與李大釗「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及其歷史意義〉，頁155-250。

從調查到調查文化：材料到論述的演變



自 1930 年毛澤東寫出《尋鄔調查》以及《調查工作》後，其調查的腳步並未停止，後雖因 1934 年蘇區淪陷而有不少散失，仍於 1937 年將剩餘部分集中後發表《農村調查》。過往這段史實多被用以強調毛澤東領導下對於調查重視的一面，1940 年《農村調查》再版的事實也僅是再度加強這樣的面向。毛澤東其中轉變的相對缺席，或正是由於在共產黨中唯有毛澤東強調調查研究的重要性。以致多半在敘述調查研究時就以毛澤東為論述核心，線性論述中不免較少提及其時所面臨的其他面向。尤其當調查本身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兩者幾可說劃上等號的前提存在時，這兩項事物到底如何結合的過程反鮮見梳理。⁶⁸我們必須注意到從尋烏到延安，中間所隔的不只是空間更是時間。自《調查工作》到《農村調查》初版、二版、〈改造我們的學習〉、〈中共中央對於調查研究的決定〉、〈關於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這中間看似連續但實際在時間上的斷裂，與毛澤東在黨中地位有著實際上的關聯。1935 年遵義會議的毛澤東，雖然取得紅軍的領導權，對於黨的方向卻仍然缺乏完全的掌控。待得 1937 年中，西安事變與張國燾的失勢，毛澤東方才有較大的空間能夠揮灑，《農村調查》的初版即是在這個相對穩定的空間先行少量發行。其序言中對於調查的描述相對保守，僅提到「這是一種歷史材料，其中有些觀點是當時的意見，後來已經改變了」。⁶⁹要說從第一版的序已經有將調查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連結，更像是想為土地革命留下些東西，與 1941 年第二版的序言所呈現出的態度有著相當的差別。

局勢總會改變，1937 年底王明的回國並未對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造成挑戰，到 1938 年六中全會在史達林的要求下毛的權勢更是得到確保。黨內的氣氛則先隨著支持王明的項英去世，繼之偏毛澤東的劉少奇掌握華北華中兩局而導向毛澤

⁶⁸ 羅平漢，《中國共產黨農村調查史》。

⁶⁹ 毛澤東，〈『農村調查』序言一〉 1937/10/6，竹內實監修，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毛澤東集》，5，頁 275-276。

東。⁷⁰毛澤東地位自 1937 年開始的逐漸穩固，也開始對於中國共產黨未來路線提出其本身的看法。不論是〈關於十五年來黨的路線和傳統問題〉、〈矛盾論〉等文的提出，都或可說是試圖掌握黨內話語權的表現。可以注意到的是此時的毛澤東尚未提出一套自己的理論，其所使用的語言仍然是基於過去黨內傳統的延伸，即便 1938 年六中全會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概念，如何實踐卻是未知。毛澤東對於中國共產黨新傳統建設的具體設計，還是要等到任弼時將《聯共黨史》從蘇聯帶回，才開始有眉目。《聯共黨史》透過對於過往革命歷史的剪裁以及再詮釋，有意識地排除列寧跟史達林以外革命參與者所付出的心力，重新用史達林的角度為過去的歷史定調。過往的研究者多已指出毛澤東透過本書學習史達林建構一元統治合法性的方式，並試圖移植到延安的中國共產黨來建立自身的權威。⁷¹史達林《聯共黨史》的毛澤東版本，便是 1941 在胡喬木及王首道協助下所出版的《六大以來》。透過《六大以來》重新定調的共產黨史，大力抨擊過去黨內存在的「左傾」路線，毛澤東的思想由此升格為黨內的正確路線。⁷²

《六大以前》上冊於 1941 年六月出版以前，對於《聯共黨史》已有基本概念的毛澤東已然開始建構一套為自身辯護同時又能表明自身特殊性的論述。新的論述必須在不違背黨的基本路線同時，又必須能突出與過往黨領導層不一樣的特點，且最重要是能與毛澤東本人於 1938 年所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觀點相切合。調查研究這一項毛澤東向來自豪，過往多被打成「狹隘經驗論」的歷史，在建構論述中的優勢便浮出來。好比說在 1939 年 10 月的〈研究淪陷區〉，重申「『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或者說『研究時事問題須先詳細占有材料』，這是科學方法論的起碼一點，並不是什麼『狹隘經驗論』」。⁷³由於此文是作為《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的序言，故仍然強調其本身為材料的性質，並指出在研究前並

⁷⁰ 陳永發，《延安的陰影》（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頁 9-19。

⁷¹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 160；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 13。

⁷²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頁 158-164。

⁷³ 毛澤東，〈研究淪陷區〉，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 2 集，頁 249。

無法實際解決問題，該書並未為此作出結論。惟從中可以發現到毛澤東為自身辯護的定調，透過將調查作為科學方法論的方式反擊所謂「狹隘經驗論」。這個傾向，到 1941 年的《農村調查》第二版的序中更為明顯。1941 年版《農村調查》的序言中，一開始便提到「所以印這個材料，是為了幫助同志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更具體來說，其目標是負責領導工作的共產黨員，所謂：

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瞭解下情，卻在那裡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於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瞭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

可以發現重點有二，一是訴說對象如前述是以領導工作，或換個角度來說，即所謂的幹部們為主；二是強調對於「實際情況」的「具體了解」。當我們進一步審視這份序言，會發現到雖然也提供調查的方法，也提及理論與實際必須配合，重點是這配合的方式，已然被「調查」這種形式所限定：

出版這個參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於指出一個如何瞭解下層情況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們去記那些具體材料及其結論。一般地說，中國幼稚的資產階級還沒有來得及也永遠不可能替我們預備關於社會情況的較完備的甚至起碼的材料，如同歐美日本的資產階級那樣，所以我們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說，實際工作者須隨時去瞭解變化著的情況，這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也不能依靠別人預備的。所以，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於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繫。「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卻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發有發言權的。...史達林的話說得對：「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繫起來，就會變成無物件的理論。」當然又是他的話對：「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除了盲目的、無前途的、無遠見的實際家，是不能叫做「狹隘經驗論」的。

在延續對「狹隘經驗論」的反擊上，更透過引入史達林的話語為「狹隘經驗論」做出定義，也讓自身擺脫這頂不利的帽子。其同時也提到因為「中國幼稚的資產階級」並沒有如歐美日本等發達資產階級一般已經為社會做過起碼的調查，所以調查中國的工作，便成為中國共產黨員的不得不然的責任。調查成為結合理論與實際的必須前提的同時，也成中國共產黨員的使命。1941年5月幹部會議上發表的〈改造我們的學習〉進一步發揚這項概念，明確地將調查研究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踐統整起來。成為與「對周圍環境不作系統的周密的研究，單憑主觀熱情去工作，對於中國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的「主觀主義」相對之「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對周圍環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當然〈改造我們的學習〉所提到的不僅止於此，其進一步提出黨未來該學習什麼：研究現狀、研究歷史以及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⁷⁴到這個階段，可以發現「調查」已經透過毛澤東的論述，由單純收集的材料，轉成為將馬克斯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關鍵的論述。

〈改造我們的學習〉發表後，隨之1941年6月發表《六大以來》上冊，透過重新詮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與路線之爭為黨內領導層帶來衝擊，毛澤東自1940年以來對王明的攻擊開始進入最重要階段。從1940年底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這個信號開始、《六大以來》的編撰、〈關於調整刊物問題的決定〉以及〈改造我們的學習〉等對內連串的削弱以王明為首國際派勢力的同時；對外則有〈增強黨性的決定〉的通告警告延安以外各根據地勿輕舉妄動，這種種舉措的開花結果便是1941年9月份政治局擴大會議中毛澤東一元統治的開端。⁷⁵就在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前，根據〈改造我們的學習〉提出的建議，8月〈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以及〈中央關於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方正式的透過法制化將調查研究透過機關設置以及對於黨員的要求給帶進中國共產黨。調查研究從單純材料蒐集的方式、毛澤東個人的「狹隘經驗論」，透過作為理論與實際結合前提的關

⁷⁴ 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收入解放社編，《整風文獻》（北京：新華書店，1950），頁49。

⁷⁵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頁158-164。

鍵與科學的馬克斯列寧主義掛勾，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工具。這一路的過程若孤立的僅就有關調查的文獻看起，則所見便是毛澤東的先知灼見。若是將其落實到自 1937 年開始毛澤東一步步向黨內最高權力者的過程來看，便會發現其運用本身的巧妙。自 1941 年 9 月從科學方法論上升到中國革命論述的「調查研究」，也即將隨著緊接而來的「整風」成為形塑中國共產黨革命文化的一環。

整風、審幹中的「好共產黨員」

1941 年從 9 月 10 日一路開到 10 月 22 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基本確立國際派的失勢以及毛澤東正式掌握黨與黨的論述此一事實，毛澤東路線也正式被確立為中國共產黨的路線。不過路線雖然已被確立，也成為黨內學習的指引。但毛澤東仍不滿足，為能確保不再受到反對者的掣肘，透過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的名義在延安發動整風。其目標或在進一步打擊王明，或在藉此建立一元統治，或乃是透過此運動淬鍊共產黨員的黨性等等有許多不同的說法。⁷⁶無庸置疑的是延安時期的「整風」，對於形塑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文化有著他者難以企及的重要性。不過「整風」是在整個什麼風？其又是如何影響到中共政治文化的形塑？或還是要從其發起開始檢視。蓋「整風」名稱的由來是自 1942 年 2 月 1 日於黨校開學典禮上的〈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對於這三風的整頓而起，具體說來其目標是學風中的主觀主義、黨風中的宗派主義以及文風中的黨八股三項。⁷⁷對於這三項的批評本身或可視為路線鬥爭後宣揚理念的自然行為，不過當毛澤東隨之提出「懲前毖後」及「治病救人」兩個口號後狀況便有所改變。何以故？若說對於前三項的批判是有著希望學生能夠避免問題，卻也終究以內在的提醒為主；隨後的兩個口號卻將批判本身化作能影響外在的行動。不過由於初期整風的態勢在當時黨校校長鄧發本身的關係，也可能是由於對毛澤東的指示不知該如何著手故整體

⁷⁶ 見陳永發，《延安的陰影》與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兩方面對於整風的詮釋。

⁷⁷ 毛澤東，〈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竹內實監修，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毛澤東集》，8（東京：北望社，1971），頁 63-85。

來說影響不大。兩個月後毛澤東介入，整風活動重新開始。⁷⁸

1942年4月，為能讓整風發揮毛澤東所設計的功用，也確保各級機關能夠有一實行的標準，〈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出台。針對過去未能有效實行整風而提出十二項建議，內容為如何進行整風提出辦法，更進一步透過指定考試教材來確保學生及幹部能夠藉由整風對黨的路線有正確認識。⁷⁹這些舉動看似平常，透過各式「反省」所產生的「徹底坦白」，為後續的「審幹」乃至「肅奸」累積可資運用的豐富材料。其實不論「審幹」、「肅奸」都並非是因著「整風」才開始，在「整風」開始以前大多流於形式，整風前後黨與非黨幹部審查委員會的成立將「審幹」提升到一個全新的階段。⁸⁰整風審幹運動中的「王實味案」則更進一步的使整個運動與「肅奸」合流，整風審幹肅奸三位一體於是成焉。⁸¹這個過程並非一步到位，大多數受到影響的學生以及幹部在開始並不會有這樣的想法，畢竟毛澤東不是說「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嗎？透過解放日報編《延安文萃》整風中自我坦白的材料或許能讓我們有更進一步的看法。

《延安文萃》〈整風篇〉的編撰其中有一個項目，是當時發表在《解放日報》上的自我批評部分，其強調這些自我批評反省自己，教育他人的功效。必須注意到這些自我批評當時會被登在《解放日報》上，是期待能夠「教育他人」的，故自然會刻意強調其受教的體會，換言之就是所謂的「樣板」。做為學習榜樣的樣板，提供一種黨所期盼的「好幹部」乃至「好黨員」的想像。自我批評中對於調查研究的態度，也可以看到當時黨對於調查研究該如何思考的「建議」。在《延安文萃》中以調查研究為題而直接相關的自我批評有匡亞明的〈論調查工作的性

⁷⁸ 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 21。

⁷⁹ 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收入解放社編，《整風文獻》，頁 1-6。

⁸⁰ 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 35-39。

⁸¹ 陳永發對王實味案有著詳細的陳述，見氏著，《延安的陰影》，頁 39-55。而高華亦有相當篇幅描寫王實味案對於整風的影響，見氏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頁 260-301。

質和作用〉、王子野的〈由“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想起〉兩篇。匡亞明的文章發表於 1941 年 11 月 29 日的《解放日報》上，其時整風尚未開始，且其文的性質主要是在講解調查研究工作到底是怎麼樣的一件事，如何實行以及其對於黨的功用，是「使黨能正確決定政策的基礎，實際行動的根據，和反對主觀主義的武器」，⁸²較偏向對於「調查研究」的講解。王子野以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為題的自我批評，坦承過去因為「雖然知道說得好，都沒有怎麼深思熟慮的去想一想，所以也並不怎麼了不起的重視他」的問題，透過學習體會到自己的無知，反省自己過去因為不了解調查研究重要性犯下的種種錯誤，「然後下決心朝著毛澤東同志所指引的首先調查然後發言的這條正確的大路走去」。⁸³這些對於「調查研究」的看法基本上是依循著毛澤東的論述發揮，雖然在教育他人的目標上有相當的可看性，畢竟這種有文化的人所寫出的東西，在說服時卻不見得如此有效。《延安文萃》應該也是在考慮過這種狀況後，在其中也選了一篇《解放日報》上登載的農民出身幹部口述稿，強化說服的力道。邵雲山口述的〈我在整風學習中〉，其口語的方式生動的描繪出一個農民出身，文化水平低落又不愛學習的幹部如何在整風學習後態度轉向的歷程。雖然說通篇並沒有直接引用到馬克斯列寧主義辯證、共產革命的實踐等等高深理論，也是因為目睹上級自我檢討時產生的感動才放心學習，從而改過。其提到的過去因為想說自己沒文化，少理論，且年輕會講會寫進步又快的知識份子愈來愈多，日常工作日趨複雜，動手就是宣傳、調查、報告，自己是吃不消，故想說乾脆退伍回家，因此不想進步不想學習。透過整風後才體會自己以往不學習、不調查、經驗主義的問題，體會到只要用心學習，還能會革命工作，還是有出息的。⁸⁴其中對於工作改變後動手就要宣傳、調查、報告的埋怨以及學習後發現老一輩經驗主義帶來的問題，卻也反映調查在黨內的日趨重

⁸² 匡亞明，〈論調查工作的性質和作用〉，《解放日報》1941年11月29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中國報刊史研究室編，《延安文萃》（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頁109-113。

⁸³ 王子野，〈由“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想起〉，《解放日報》1942年6月1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中國報刊史研究室編，《延安文萃》，頁153-155。

⁸⁴ 邵雲山，〈我在整風學習中〉，《解放日報》1943年11月1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中國報刊史研究室編，《延安文萃》，頁162-167。

如果說整風中建構出黨內往後自我批評的方式，其教材的設計卻也同時提供一條指引的道路。依照教材形成的自我批評，正是此種概念的顯現。僅依賴這樣的方式，卻不見得能夠使黨員都走向學習良好標竿的方向。進一步的推力，或便來自於整風、審幹、肅奸以及「搶救」合流。「王實味」案對於當時的延安大眾揭示一條如果被判斷出有問題的想像，隨後因應肅奸來的「搶救」更加劇對黨的畏懼。對當時延安的黨員幹部而言，黨籍的有無決定的絕非僅是思想的考驗，更是關乎自身生計的現實議題。⁸⁶一元化官僚體系的內部壓力導致「積極」「不積極」判定重要性隨之高漲，「積極」表態的概念在於不是有做會怎樣，是對於不作會怎樣的「猜想」。這種對上級揣測及預期的心理，王汎森的描述頗為傳神：「…下面的主動性及對策性，也常無限地擴大了上面政策的效力，靠著揣測、靠著某種程度的自我靈活性，擴大了上面政策的效力…」⁸⁷。雖然王汎森此言是出自對於清代文人在文字獄下自我限制的觀察，不過這種對於上級意向的揣測卻非清代所獨有。某種程度上來說，實乃一種在面對不可預測權力壓迫下的自保之道。在如何表態的方面向上，投黨所好是一條相當明確的道路，且更重要的是，黨的喜好並不模糊，整風期間要求學習的材料成為效法的標準。作為學習文件中佔有相當比例的「調查研究」概念，其有著從毛澤東方開始特別注意的特點，學習及效法本身似乎都具有向正確路線表態的主動優勢。或說，正由於調查研究的重視並非黨過去的傳統路線，是透過毛澤東才被發掘出與革命實踐的重要關聯。對於坦白、改進都有著相當的誘因：眾人過去的錯誤係來自於高層路線問題，所幸有賴毛澤東同志的指引，未來必會進行調查研究，走上正確的道路。一推一拉之間，論述

⁸⁵ 邵雲山，〈我在整風學習中〉，《解放日報》1943年11月1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中國報刊史研究室編，《延安文萃》，頁162-167。

⁸⁶ 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91，其雖主要是以此描繪「搶救」活動，但此種壓力其實屢見不鮮，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頁177-180。則提供我們對於當時延安幹部生活的描繪，補充此種對於生計恐慌背後的物質基礎。

⁸⁷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收入氏著，《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頁502。

也從外在進入到腦袋，調查研究作為毛澤東路線的代表透過黨員的實踐具體化。進一步的說，則從事調查本身是一種對於毛澤東路線的表態。故不論調查結果、不論正確與否，調查是毛澤東路線的實踐，是共產黨員的優良作風，調查研究作為一種政治文化也就此進入中國共產黨中。⁸⁸

調查為何作為一種文化？

本章從共產黨內「調查」文化的形成入手，發現到或許兩黨對於調查文化的差異可能是來自於兩黨共同面對的問題：不論蔣介石或是毛澤東，本身都非原本該黨理論上的接班人。簡單來說，得位不正的結果使得兩人都必須透過別種黨內原先不存在的方式來正當化自身。

本章曾經提到過毛澤東掌權與共產黨調查文化發展的同時性似可作為研究蔣介石與國民黨關係的對照。按照這個角度來說，我們可以發現蔣介石自發跡乃至掌權有兩個體系的功勞不可謂不大：黃埔軍以及透過婚姻所取得的江浙財團。但即便如此，1931年底蔣卻仍然因為在「無幹部、無組織、無情報」的情況下下野。也正是因此次下野迫使蔣介石開始改變，待得1932年復歸後大力發展「力行社」等組織，藉此在軍隊、財源等優勢外鞏固黨內。但必須注意到，其並未對於進一步在孫文學說之外另外提出見解，只是進一步透過現實的實力確保自身的位置。呂芳上稱其為「繼承性創業者」可說點出了蔣所謂「繼承」的奧妙。⁸⁹這也影響蔣本身與其所帶領下國民黨的性格，說好聽是承襲孫文革命思想傳統，實

⁸⁸ 張聞天的調查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其詳細經過可參考楊忠虎、劉曉梅，〈張聞天在延安整風期間的調查研究活動〉，《中國延安幹部學院學報》，2009：3（延安），頁54-58。其論點本身無太多新意，一如既往地強調張聞天本身乃是因為「學習」後才主動出延安進行調查。反之，陳永發則認為張聞天乃是被毛以調查的名義給趕出延安中央，見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16。這兩個說法其實可以算是一體兩面，張聞天確實是以透過進行調查對毛澤東表態，但其長達一年不讓回延安的調查研究歷程，也多少跟毛澤東想要藉此教訓張聞天有關。

⁸⁹ 呂芳上，〈導言〉，呂芳上等，《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台北：時報出版，2011），頁7-14。汪朝光等，《天下得失：蔣介石的人生》（香港：中和出版，2012），頁130-133。

話卻是無法對思想有進一步的提升，只能就外在要求。黃仁宇所觀察到，或可說正好是兩黨性格在其領導人帶領下所呈現的精華。

反觀毛澤東起家雖同樣是因掌握軍隊，終究兩黨構成邏輯本身的不同使得毛澤東必須為在掌控黨之外，也需要掌握黨的話語權。是故其需要〈實踐論〉〈矛盾論〉等著作來證明學歷不如人，亦無留外經驗的他也有著論述的能力。期間雖然說抗戰局勢的變化加上國際派自身的內鬥都削弱與毛澤東抗衡的能力，毛雖愈來愈能將黨置於其掌控中，在話語權的爭奪上卻總是不如國際派高喊的「正統馬列主義」。不過由於 1938 年史達林授意下所著作的《聯共黨史》的出版及翻譯，為毛澤東提供話語權爭奪的新的可能。調查研究便是在這樣的脈絡下，成為毛澤東運用的工具。《農村調查》從 1937 年的材料到 1941 成為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前提，這其中的轉變明顯可以看出有相當的落差，「狹隘經驗論」的批評反成為毛澤東與國際派最大的差異。當毛澤東宣稱唯有透過調查，方能將馬列主義實際運用來解決中國的問題時。自這刻開始，科學方法論的調查研究在共產黨的語境脈絡中被賦予新的意義，從工具上升到論述的層面。⁹⁰

論述如果僅是作為文件的宣示卻沒有進入到共產黨員的思考中，則只怕會跟國民黨員停留在口中的三民主義一般，無法對中國共產黨留下如此大的影響。1942 年開始的整風運動提供將做為論述的「調查研究」灌注進黨員思考中的可能。這種可能並非單純來自於對於黨所指定文件的學習，雖說黨指定的 22 項文件由於作為測驗的標準而有使黨員學習的動力，惟僅就拉力的部分單方面的思考只怕有所不足。如果將黨員推往標竿的另一股動力也考慮進來則可信度至少高許多，亦即是與整風和在一塊的審幹、肅奸與當時共產黨已然形成的「一元化官僚統治的內部壓力」。整風要求的對於過去錯誤的坦白，雖說在「懲前毖後」及「治病救人」下看似不會對黨員造成直接的危害，隨後的審幹乃至肅奸就不太一樣了。尤其是本章一再引用的「一元化官僚統治的內部壓力」概念下對於當時在延安的

⁹⁰ 有關蔣介石與毛澤東兩人因其差異導致的國共兩黨文化不同上，可參戴鴻超，《槍桿、筆桿和權術 蔣介石與毛澤東治國之道》（台北：時報，2015）。

幹部群體所形成的心理壓力，重點或許不在於從事調查可以得到哪些福利，問題在對於如果不調查會「怎樣」的猜想。

黨內的文件提供對於「好共產黨員」的描述，其中有關「調查研究」的強調使得黨員能較具體的有所依循。不論是在自我的檢討或是改正的建議上，調查都是一個可資利用的好口實。畢竟調查研究的強調是自毛澤東同志才開始大力倡導，檢討時坦承「自身過去因無知沒有從事調查研究，將來必定會進行調查研究這樣的方式」，為自己脫罪的同時也替自己打出對新路線支持的好印象，總的來說沒有壞處。如此的狀況先不論到底當事人之後會不會實際從事調查，當在黨中央以及黨員的概念中都已經確立「好共產黨員必須要會從事調查」的概念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傳統於焉生。這個過程本身即反映一種權力下滲到行為與思維的歷程，或也能作為「權力的毛細孔作用」的當代例證。我們也可以說，這種下滲所反映的是革命與作為科層體系的黨組織互動的一環。透過整風，新的路線或說新的「革命」得以進入科層。

過去思考國共兩黨調查時往往容易陷入這樣的泥淖。為明白兩黨調查的差異性而絞盡腦汁，試圖就文本本身尋找出兩者的異同，實話來說卻並不難做到。畢竟兩黨的敘述方式以及文句的差異性實在太大，辨別兩者難度不會太高。只是說當要論斷為何導致兩黨的差別時，卻往往難以提出有信服力的說法。兩黨「調查」不能比較的原因，並不在於高層次的理論差距，只是單純兩黨的用法從一開始便走向不同的境界。也就是說，雖然調查被視為「正當化」施政的前提是兩黨都會使用的方式。共產黨卻在此之外將「正當化」的運用上升到對於毛澤東路線的認同上，兩方面來說一是毛澤東透過調查正當化其路線；二是科層藉由進行調查一事表現出對毛澤東路線的認同。但要進一步檢視科層如何運用這項工具還是要待下一章晉綏的土改來一探究竟。



第四章 晉綏土改與糾偏—調查、複查、再調查

我認為過去一年內，在晉綏分局領導區域內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是成功的。這是從兩方面來看的。一方面，晉綏黨反對了右的偏向，發動了羣眾鬥爭，在全區三百多萬人口的二百幾十萬人口中，完成了或著正在完成著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另一方面，晉綏黨又糾正了在運動中的幾個左的偏向，因而使全部工作走上了健全發展的軌道。從這兩方面來看，晉綏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我認為是成功的。⁹¹

1948年4月1日，毛澤東率領中共中央機關路過晉綏解放區，在幹部會議上對於自1947年1月以來晉綏分局在土地改革以及整黨工作的成績做出以上的評論。在這段時間中，晉綏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工作先後根據〈五四指示〉、康生、陳伯達晉綏邊區工作團的指導、《劉少奇同志在六地委報告中關於工作與土地問題》、〈告農民書〉、《土地法大綱》及至《關於劃分階級成分問題的指示》〈關於糾正左的危險的指示〉、〈關於糾正錯定成分與團結中農的指示〉等項指導原則不斷改變其進行的方式。以反右為名造成的破壞以及死傷，正好提供糾偏成功的土壤，兩方面的成功並非單向，是透過相互依存方有可能實現。圍繞1947年初開始到1948年中這一段時間的晉綏根據地，⁹²多半離不開土改、糾偏兩個面向，隨之開展的研究集中在土地革命的歷程、影響與對於「左傾」錯誤的討論。總的來說不脫毛澤東1948年的定調，承認土改期間雖確有發生問題但在中央的介入下也已解決，更重要是土改成功此一事實。⁹³在左傾與隨後的糾偏議題上，則因著

⁹¹ 毛澤東，《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竹內實監修，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毛澤東集》，10(東京：北望社，1971)，頁127-141。

⁹² 晉綏根據地，成立於1937年底，並於1949年2月15日撤銷。轄晉西興縣、嵐縣、神府、保德、河曲、五寨、岢嵐、神池、偏關、平魯、朔縣、左雲、右玉、懷仁、大同、山陰、寧武、靜縣、忻縣、諄縣、中陽、石樓、臨縣、離石、枋山、靜樂、孝義、靈石、汾陽、平介、文水、交城、太原、清源、徐溝、陽曲、洪趙、汾西、大寧、永和、隰縣以及綏遠和林、清水河、涼城、歸綏、武川、桃林、興和、集寧、丰鎮等五十縣，穆欣，《晉綏解放區鳥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頁3。

⁹³ 如羅平漢，《土地改革運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何東、清慶瑞等編著，《中國共產黨土地改革史》(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3)、趙晉，〈晉綏土地改革的成

康生被認定促成左傾的主要負責人，故能有一較明確的目標可做文章。⁹⁴除康生外的他者則多半強調其在糾偏中所扮演的角色。⁹⁵其他在主旋律外的課題較為重要的則是關注《晉綏日報》與土改後期的整黨、反客里空運動。⁹⁶即便如此，其研究的成果卻也難脫已然被設定的基調。畢竟土改的成功及隨之來的動員基礎此一在國共內戰中，作為中國共產黨得以勝出主要原因的連結存在的前提下，不論研究如何開展似乎總是難以擺脫基調的影響。⁹⁷本章雖亦以土改與糾偏為名，主要的關懷卻無涉於此，希望能夠透過兩個時間的斷點一探「調查」在這一年多時間內所扮演的角色。

本章所關注的兩個時間斷點，分別是從康生帶領的土改工作團試點開始的「左傾」歷程以及 1947 年 12 月楊家溝會議開始的「糾偏」之路。這兩件工作其發起都係基於「調查」而有如此行動，所得到的結論以及其後的進行卻又為何有如此不同？更有趣是這兩項截然相異運動的「成功」到最後竟是同時成立，作為起手式的「調查」到底又如何能解釋這樣的情況？本章以此疑問展開，希冀能夠探明其中蹊蹺，從而理解「調查」的運作機制。探究的起點卻非順流，反過來透過定調或能有更貼近當時思考脈絡的發現。準此，首先必須釐清的問題在於到底糾偏是糾哪些？在講話中，毛澤東提到晉綏黨糾正的三個偏向為「第一，在劃分階級成分中，在許多地方把許多並無封建剝削或者只有輕微剝削的勞動人民錯誤地劃到地主富農的圈子裡去，錯誤地擴大了打擊面」「第二，在土地改革工作中

績和偏差》，《理論探索》，1990：2（太原），頁 73-75。

⁹⁴ 主張康生需為土改的左傾負責的如牛崇輝，〈晉綏土地改革運動中的康生〉，《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4（臨汾），頁 107-109、程敏，〈黨內大奸〉（北京：團結出版社，1993）。近年有關該為「左傾」負責的人是誰開始轉向，從以往多歸之康生轉而認為劉少奇才是最關鍵的角色。如智效民，〈劉少奇與晉綏土改〉（臺北：秀威資訊公司，2008）以及馬飛，〈山西臨縣 1946-1948 年的土地改革運動〉（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1）。

⁹⁵ 如牛新宇，〈任弼時與晉綏邊區土地改革〉，《黨史文匯》，2012：4（太原），頁 54-57、牛崇輝，〈葉劍英與晉綏土改糾偏〉，《紅廣角》，2011：10（廣州）頁 30-33、賈巨川，〈習仲勛在土改中防左糾偏〉，《炎黃春秋》，2007：10（北京），頁 32-37、牛崇輝，〈謝覺哉與晉綏土改〉，《山西檔案》，1992：5（太原），頁 33-34。

⁹⁶ 見何立波，〈《晉綏日報》與反「客里空」運動始末〉，《鐘山風雨》，2014：1（南京），頁 4-7。

⁹⁷ 如李金錚，〈「理」、「利」、「力」：農民參軍與中共土地改革之關係考（1946-1949）—以冀中、北嶽、冀南三個地區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93（臺北，2016），頁 87-134；更全面的討論可見陳耀煌，〈傳統與現代：中共土地改革的歷史意義再思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00（臺北，2015），頁 171-182。



侵犯了屬於地主富農所有的工商業；在清查經濟反革命的鬥爭中，超出了應當清查的範圍；以及在稅收政策中，打擊了工商業。」以及「第三，在過去一年的激烈的土地改革鬥爭中，晉綏的黨組織沒有能夠明確地堅持我黨嚴禁亂打亂殺的方針，以致在某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中不必要地處死了一些地主富農分子，並給農村中的壞分子以乘機報復的可能，由他們罪惡地殺死了若干勞動人民。」⁹⁸更簡要來說是錯判階級、侵犯工商業以及亂打亂殺三個面向。時間再往後撥一些，1948年8月15日晉綏分局宣傳部發出〈關於去年土改中我們在宣傳黨的政策上所犯的左的傾向與錯誤的檢討〉則將其錯誤歸納成幾個問題，分別是：劃分階級問題、團結中農問題、亂打亂殺問題以及批評與自我批評問題，其總結是在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發來後即已修正。⁹⁹待得1949年1月30日中共中央晉綏分局對於土改以及整黨工作提出其基本總結的提綱，整理出來的錯誤則有五點：劃分階級成分、平分土地、亂打亂殺、對中農政策以及侵犯工商業。¹⁰⁰可以注意到這三份對於晉綏土改總結的文件中所提基本大同小異，其中作為問題起點的核心基本都是來自於對階級的錯判，其後的各種傷害都是先以此出發；亂打亂殺則或可稱是火上加油的添加物，雖非問題的起點，但總是讓問題愈發擴大且惡化。

表面看來問題在於「錯誤劃分階級成分」，但階級的對錯如何又該如何評斷其實也難說。不過若是以共產黨的標準作為判斷，從1942開始到1948年這一段時間中的變化或許可以說當作問題探討的起點。

⁹⁸ 毛澤東，《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竹內實監修，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毛澤東集》，10(東京：北望社，1971)，頁127-130。

⁹⁹ 晉綏分局宣傳部，〈關於去年土改中我們在宣傳黨的政策上所犯的左的傾向與錯誤的檢討〉，收入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 農業篇》(太原：山西省檔案館，1986)，頁485-490。

¹⁰⁰ 中共中央晉綏分局，〈中共中央晉綏分局關於土改工作與整黨工作基本總結提綱〉，收入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 農業篇》，頁491-514。

土改前的調查與階級



毛澤東於 1948 年路過晉綏時，對於康生取消晉綏分局於 1946 年 9 月因應〈五四指示〉後所頒布的〈怎樣劃分農村階級成分〉這件事感到惋惜，並對時任後委的楊尚昆多所抱怨。這一份被毛澤東視為「馬克思主義的」的文件，其形成的背景如前述是為能有效的在中共中央政策從抗戰時期的減租減息轉換至土地改革運動所做的先期準備。¹⁰¹背後的基底是 1946 年 6 月所提出的《農村土地及階級變化材料》，在〈怎樣劃分農村階級成分〉於同年 9 月公布後一直到康生率領工作團到來前，晉綏根據地土改的進程相對溫和。箇中原因無他，晉綏根據地在自 1938 年底已然在共產黨主政下經歷 8 年（1938 年 12 月-1946 年 6 月）以上的歲月。各類就 1933 年毛澤東所提出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或是 1939 年所提出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所提到的各「階級」基本上都已為黨所掌握。更確切的來說，晉綏的階級組成以及土地狀況早已大幅的經歷過變革，趨近於共產黨的規劃，這一點透過晉綏地區 1942 年、1944 以及 1946 年經歷過的調查或可略見端倪。這些調查並非憑空至，遠的來說可與 1941 年 8 月在整風過程中所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相連，近一點則是因應 1942 年 1 月 28 日的〈關於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後提出。也因此，土地的佔有方式為主要的觀察點，相應的階級判斷也由此而生。

以 1942 年來說，張聞天的晉陝調查團本身即可視為是整風運動中的一環出現，¹⁰²韋文〈晉西北的土地問題〉則與 1942 年初的土地決策相關。¹⁰³〈晉西北的土地問題〉主要關注的在於土地的分配和使用、勞動力與耕畜以及土地關係的動態等三項。在其敘述中，並未強調階級的劃分與流動，直接切入各階級所佔有

¹⁰¹ 張稼夫述，束為、黃征整理，《庚申憶逝》（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

¹⁰² 有關張聞天的晉陝調查團，可參見論李金錚、鄧紅，〈抗戰時期張聞天主持的晉陝農村調查〉《抗日戰爭研究》2008：1（北京），頁 183-209。

¹⁰³ 韋文，〈晉西北的土地問題〉，收入中共呂梁地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編，《晉綏根據地資料選編（第二集）》，（出版的不詳：中共呂梁地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1983），頁 287-296，原載 1942 年 4 月 20 日《解放日報》。

的土地以及畜力多寡，藉此描繪出剝削進行的狀態。即便如此，卻也點出土地由地主向農民群眾流動的趨勢。至於另一方張聞天的調查，則更集中注意到在共產黨治理下階級關係的變動，其三個主要調查：〈陝甘寧邊區神府縣直屬鄉八個自然村的調查〉〈晉西北興縣二區十四個村的土地問題研究〉以及〈米脂縣楊家溝調查〉。雖說在寫作上的篇幅及行文都有不小的落差，其中對於階級的屬性與變化的關注卻都是在文中反覆出現。其對於農村階級的觀察，點出抗戰以來農村階級所發生的大幅變動。

變動的動力來自戰爭與革命，其變動的特性在於階級的突變——從改變剝削方式到轉變經濟。帶有封建性質的地主因為日軍的侵犯（商業破壞）以及共產黨的政策（減租減息），逐漸衰落而富農流動。富農雖說因著商業被破壞導致經營範圍縮小，總體的量是增加的。至於中農則是由於減租、擴兵增加負擔，量較以往來得少。貧農得利大，有不少向中農上升，同時工人、雇農等也因工作減少加上土地取得容易往貧農過渡。整體來說階級變動佔總數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¹⁰⁴ 這個階級變動的趨勢並未在 1942 年停止，到 1943 年回顧時，基本上可說是延續 1942 年的狀況持續邁進。地主戶數總佔比從戰前的 5.9% 到 1943 年的 4.9%；地主戶將近三分之一的改變原有地位，三分之二轉富農，三分之一轉中農；總土地的佔有從戰前的 31.7% 到 20.8%，每戶平均占有土地從 555 畝（人均 105 畝）到 516 畝（人均 75 畝）。富農戶數增加，從戰前的 7.9% 到 8.4%，不過經濟單位因為由於戰爭、減租減息與較重的負擔，在扣除由地主轉富農的部分反有所縮小。中農的力量增加，陣營擴大，總戶數佔比由 26.4% 到 30.4；其中有 30% 是由其他階級轉來，以貧農為多數，雇農、工人、商人和個別的地主向中農階層靠攏；土地方面雖然佔比提高，由於新生中農土地較少，平均上來說每戶及每口平均土地還及不上戰前；另一方面來說，牛的增加也使占總牛數由四分之一強上升到三分之一。貧農則是生活改善，經濟地位逐漸上升；總人數從戰前的 47.5% 到 40%，

¹⁰⁴ 張聞天，〈關於當前農村階級變化問題〉，收入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等編，《張聞天晉陝調查文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頁 297-303。

土地有所增加，從 13.9%到 14.8%，每人平均地從 5.7 畝到 6.3 畝。此外，雇農減少工商業亦向農業轉化。階級屬性上：

地主階級，開始分化，封建經濟逐漸的削弱；...中農貧農逐漸上升，富農經濟雖一度緊縮，今天已有某些發展，但發展的過程是遲滯的；雇農工人商人及其他職業者，大批的向農業方面轉移，使貧中農的隊伍相當擴大，這是階級變化關係的全貌。...過去經濟上的半封建性也在逐漸削弱。¹⁰⁵

其總結則指出：

地主階級在我們的削弱而團結的政策下面，他們的政治地位降低了，經濟力量也有了削弱。貧農和中農，由於減租減息的運動，由於負擔的減輕，由於農貸政策及一切扶助政策的實行，他們的政治地位提高了，經濟地位相對的得到改善。抗戰和晉西事變後，幾年中間階級關係上，已經起了相當的變化。¹⁰⁶

到 1944 年 10 月，晉綏分局調研室發出〈階級關係及土地佔有的變化〉，1942 年開始的趨勢持續發酵，其提到地主階級幾乎全部向下，成分下降者一半，經濟情況下落者一半，只有個別地主能維持原狀；富農三分之二下降，三分之一維持原狀；中農三分之一得到發展，更多持平；貧農大部分發展，三分之一已經上升，三分之一得到發展，三分之一維持原狀；雇農工人上升，三分之二上升，其餘三分之一，大部分得到發展，小部分維持原狀。原先最大階層的貧農由於不少人上升，使中農反佔到各階層的第一位，且貧中農一般都或多或少得到發展。箇中原因則一如前述，減租減息、戰爭對商業的破壞以及增加的負擔。土地方面佔有比例方面，從原先地主、中農、富農以及貧農的排序洗牌成中農、貧農、富農以及地主。原先土地 56%是由人口占比 20%的地主富農持有，到調查時則 73%的土

¹⁰⁵ 〈晉綏革命根據地建立初期經濟狀況及土地關係的變化情況〉，收入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 農業篇》，頁 83-92。

¹⁰⁶ 〈晉綏革命根據地建立初期經濟狀況及土地關係的變化情況〉，收入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 農業篇》，頁 83-92。

地已由佔 80%人口的中農、貧農、雇農工人所持有。其中另有提到土地佔有的移轉，是從 1942 年開始有比較明顯的傾向，尤其 1943 年更是關鍵性的土地由地主富農移轉到貧農的手上。1944 年則由於調查時正值春耕，不是土地變動的時節故數量較少，即便如此亦有不少的土地移轉。¹⁰⁷可以發現，從 1942 年頒布〈關於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以來晉綏地方的土地以及階級關係基本上大致朝向共產黨所希望的方向前進，在減租減息等政策的推動下，地主經濟、政治地位的下降以及貧農中農的翻身都似乎佐證共產黨真的已為地方帶來巨大改變。實際來說，〈五四指示〉頒布後的大概狀況是否與此相符？或許還是要就 1946 年的當下一探究竟。

隨著 1946 年 5 月頒布的〈五四指示〉中宣示要進一步地將土地從減租減息改為沒收土地分配給農民的前提下，前期各地委在處置上的分歧，使得晉綏分局為能確認何謂地主這個基本命題開展調查。在其調查中指出，歷經 6 年歲月晉綏地方大部分的土地早已從地主富農往中農、貧農、雇農工人等流動，群眾土地佔比從不到 40%進展到 83.1%。¹⁰⁸也由於土地已在相當大的層面上流動，作為〈五四指示〉目標的地主階層相對模糊，在這個基礎上晉綏分局研究室所發的〈怎樣劃分農村階級成分〉成為實際執行的指導原則。文件開宗明義就點出由於過去常常在執行政策時嚴重侵犯中農、過分傷害富農的紀錄。這箇中原因，除不了解黨的階級政策外，另一種便是不懂怎麼劃分階級：單看財富多少、生活好壞不管其他面向；不管實際，總覺得村子中一定有地主、富農、中農、貧農等階級，在「筷子林中選旗桿」，不管夠不夠上，頂大的是地主、次大富農，再次中農一路排下；死抓一點，不看其他方面，凡出租便是地主不看多少，為何，租種遞變是貧農，雇長工便是富農；也有按思想好壞訂成分，富農政治上不滿便定為地主等種類繁多錯劃階級的方式。

¹⁰⁷ 〈階級關係及土地佔有的變化〉，收入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 農業篇》，頁 106-130。。

¹⁰⁸ 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晉綏革命根據地大事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頁 320。

是故為能正確的執行和貫徹黨的階級政策，如何正確的劃分，就成為必須解決的問題。在文件中對於劃分階級提出的核心標準，便是根據剝削關係和剝削的性質，其中靠土地和放帳吃利者是封建性質的剝削，是為地主；用工資和底墊（資本）剝削，是資本主義性質剝削，便是富農。其他次一級的標準則包括財富多少，家當大小，生活好壞，剝削和受剝削的輕重；來源和歷史等幾項。且由於實際社會的往往一身兼有各種性質的東西，在判斷上就是要抓住主體，看他以那一方面為主，就根據那一方面。為更具體的說明，〈怎樣劃分農村階級成分〉進一步的將農村劃分為以下幾個階級並附上實例參考：地主、經營地主、破落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雇農、產業工人、手工業工人、學徒、手工業者、作坊主、商人、自由職業者、貧民、流氓無產者以及其他。雖然提供實例，有三個問題還是常會搞錯的：經營地主和富農、富農和富裕中農、商人的土地問題。總的來說，劃分階級的目標有二：（一）政治上分清敵我並知道要與那些人聯合（二）實行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增加生產，便利資本主義的發展。文件的最後，指出由於過去在劃分時的錯誤，混淆封建剝削和資本主義剝削，導致經濟發生問題，為避免這樣的情形再度發生，正確的劃分階級是必須的。¹⁰⁹

惟〈怎樣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發布後不久，隨著晉冀魯豫根據地在土改上「屢獲成績」，晉綏分局開始轉變態度。當中央派出工作團協助各地方推行〈五四指示〉，康生將晉綏根據地過去的努力完全推翻，提供一套新的「正確」劃分階級的方式。¹¹⁰並在結合群眾運動下，將整個晉綏一路帶往「左傾」的激進道路上。

¹⁰⁹ 中共晉綏分局研究室，〈怎樣劃分農村階級成分〉，收入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 農業篇》，頁 328-343。

¹¹⁰ 雖說有關〈怎樣劃分農村階級成分〉更早一些已由李井泉口頭廢除，仍必須注意到對於土改「左傾」的主要負責人劉少奇來說，其不以李井泉的談話而以康生透過「調查」的經驗作為贊同擴大土改的理由這項事實或可初步見到「調查」作為政治運用的端倪。馬飛，〈山西臨縣 1946-1948 年的土地改革運動〉，頁 21-38。

不斷建構的表與裏



〈怎樣劃分農村階級成分〉雖然推出作為晉綏分局處置土地改革運動的指導，不過隨著同時間晉冀魯豫根據地土改方面愈演愈烈，間接迫使晉綏分局在土改上要有更進一步的舉動。作為回應的手段，晉綏分局透過包含「複查」、發動群眾等手段試圖在曾被認定「基本解決」的晉綏找出能夠更多可以拿出來分配的土地。在這個基礎上，從 1946 年底到 47 年 1 月晉綏分局開始大量派出公作團前往各地進行「複查」。¹¹¹不過，在這個階段時期的諸多工作雖說已然開始走向極端，跟之後「左傾」尚有一段距離。畢竟，從「基本解決」到「大有問題」與完全否定是不可同日而語。康生的到來，卻為晉綏的土改帶來新的起點。

1947 年 1 月，中共中央向晉綏分局發出〈關於派考察團幫助解決土地問題〉的指示，康生、陳伯達就此率工作團前來。2 月到達郝家坡後，不過一個月，便提出根據其調查結果，過去的土改成果是有問題，必須重新來過的結論。¹¹²其先是指出過去的土地移動並未真正的使得農民獲得土地，實是地主為逃避負擔而高賣給農民的過程，晉綏的土改本身並未能達到「五四指示」的要求。既然過去的土改有問題，那根據「五四指示」要分土地時，就有必要將已然透過脫手土地成功改變成分的地主一一揪出，好讓農民得以「耕者有其田」。先不論這一推斷是否正確已無從考證，更重要的在於當結論出來後，進一步的舉動，也就是透過發動群眾，將「地主」找出來。這個方式雖說剛推動時有些困難，隨著工作團的介入以及民眾情緒的帶起很快的就陷入亂打亂殺的階段，似也為晉綏之後的土改帶來陰影。¹¹³

不過正如近來研究陸續指出的一般，即便康生不論是對郝家坡抑或是更上層由晉綏分局所發出的〈怎樣劃分農村階級成分〉有著不少意見，但其並未直接認定整個晉綏解放區都有問題。真正讓火燒遍晉綏的原因，怕還是要從劉少奇身上

¹¹¹ 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晉綏革命根據地大事記》，頁 341。

¹¹² 馬飛，〈山西臨縣 1946-1948 年的土地改革運動〉，頁 21-38。

¹¹³ 程敏，《黨內大奸》，頁 221-232。

尋找。1947年4月，劉少奇帶領中央工委路過晉綏，並發表相關談話。晉綏分局隨後也將其談話印行，題為《劉少奇同志在六地委報告中關於工作與土地部分的摘要》。更重要的或許是隨後劉少奇發給晉綏分局的一封信〈劉少奇同志關於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給晉綏同志的一封信〉，其隨後被毛澤東所承認並推行到晉綏之外。信中肯定郝家坡的群眾，卻憂心指出由於過往發動群眾多半是一個一個孤立的點，未能達到由村而區政府、縣政府的方式，搞好的村子如海中孤島，工作團一走，群眾勝利無從保證，工作又可能垮台。是故「沒有一個系統的，普遍的，徹底的群眾運動，是不能普遍解決土地問題的」¹¹⁴。全信的脈絡以此為出發，點出「土地問題的普遍解決，必須而且是依靠群眾的自發運動」，更提到「我們的幹部不信任群眾，違反群眾路線，不尊重與傾聽群中的意見，不根據群眾的自覺與自動去指導群眾運動，是你們這裡許多群眾運動失敗的原因。」¹¹⁵。從該信中我們看到從土地革命到群眾運動再到整黨這一條順勢發展的脈絡，也必須注意到其實這條脈絡並非自康生或劉少奇到來才有。自晉綏分局開始執行複查後，便一直隱隱出現的狀況，康生與劉少奇的重點在於大力提升群眾運動的重要性。其隨後並透過一連串的會議逐漸發酵，並在《告農民書》得發行後達到高峰。

就在從復查開始到《告農民書》發布，作為官方媒體的《晉綏日報》基本上是時刻的跟著這股潮流進行，並因應需要為整個土改運動提供彈藥。這裡所說的彈藥基本以下兩種為主：對於當前工作的肯定以及工作前的慘況。其表現的手法可以是小專欄、回憶、文告乃至大篇幅的報導。某種程度來說，其也成為一種對特定現實的重現。若說過往的調查其實是透過文字建構對社會的理解並檢證政策推行的效果，這樣一來用「調查」來理解《晉綏日報》本身的文字似也未嘗不可。在這個基礎上，結合當時其他的「調查」可以發現到晉綏社會在1946年到1948年初土地改革運動中種種值得玩味的趨勢與變化。當然若是一一細察《晉綏日報》

¹¹⁴ 劉少奇，〈劉少奇同志關於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給晉綏同志的一封信〉（1947/4/22），收入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 農業編》，頁360-365。

¹¹⁵ 劉少奇，〈劉少奇同志關於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給晉綏同志的一封信〉（1947/4/22），收入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 農業編》，頁362。

自創立以來的報導，自有益於能更全面的將自減租減息以來的種種變化掌握。若是要聚焦於 1947 年的土改運動本身的特殊性，由所謂馬列主義文件〈怎樣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發布前後做為起點，或更能對於 1947 年報導中社會面貌的落差有所體會。

必須注意到的是如前所提，〈怎樣劃分農村階級成分〉在發布後不久也很快地被推翻，至少其推出的原因也是在於應對當時逐漸升溫的群眾運動。翻開 1946 年 9 月的晉綏日報，可以發現到當時的報導中所呈現出的種種對於事態的反思：9 月 2 日〈離二區群運中的嚴重錯誤 亂反亂鬥中中農也獻地了〉、9 月 6 日〈神池檢查群運偏差 誤鬥大批中貧農〉、9 月 11 日〈侵犯中農利益的嚴重惡果中農賣地縮小生產〉、9 月 12 日〈損害富農自耕地與紡織業九區幹部竟計畫削弱八十畝以上的富、中農〉、9 月 15 日〈中陽縣領導思想上糾正侵犯中農利益不堅決〉等等一連串的報導都對於群運侵犯中農愈趨嚴重的狀況作出描述。事實上就如 9 月 12 日小評〈向群眾工作者進一言〉即提到「這一個時期，報紙上為了糾正羣運中侵犯中農利益的偏向，用了很大的篇幅，以許多活生生的事實，從各方面解釋了我們發動羣眾，清算減租的政策與方針。」¹¹⁶一般可以發現到此段時間中晉綏分局的轉向，〈怎樣劃分農村階級成分〉順理成章在如此脈絡中推出。

不過，遠方解放區土地改革運動帶來的壓力到最後還是逼著晉綏往愈趨激進的方向前進，其背後的原因卻更多來自於現實的需求。由於當時主要需應對的威脅來自於國民政府方面的攻擊，故報紙上雖然提出土地分配仍然有問題，整體來說卻未有進一步過激的傾向。1946 年 10 月 26 日推出的〈分局關於發動羣眾解決土地問題的補充指示〉，明確將土地問題與堅持與敵鬥爭、踴躍參軍、自願歸隊以及努力生產等與國民黨鬥爭連結。¹¹⁷隨之的 11 月 7 日〈河、保、岢、五等縣大量農民尚未獲得土地〉點出即便是老解放區的晉綏境內卻仍有縣有三分之一

¹¹⁶ 〈向羣眾工作者進一言〉1946/9/12，《晉綏日報》14，頁 46。

¹¹⁷ 〈分局關於發動羣眾解決土地問題的補充指示〉，收入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 農業編》，頁 344-350。

以上的「空白村」、11月10日〈五寨全縣地主尚擁土地二萬餘垧 佔全縣土地百分之六十〉等等，可以窺見當局希望透過土地改革發動更多羣眾以因應戰事的目標。不過，隨著下旬戰情漸趨穩定，則有關土改的報導又開始多起來，此時的筆調除1947年1月19日以頭條報導〈保德下穿坪村被殺人惡霸統治四年〉並做一整頁專題外，其餘大多的報導都是強調土改已漸趨成功的樣貌，土改更看似要在春耕前完成。¹¹⁸可以說，在1947年之前晉綏分局已然有著要將因〈五四指示〉而起的一團混亂終結的打算。不過，1947年初來自中央的意向卻硬生生地打斷這個目標。

就在時序進入2月中旬開始有轉機，2月14日二版登載〈封建勢力依然沒有打垮 基本羣眾受了嚴重損害〉的報導。文末雖提到工作團到達後已根據上述狀況，協助幹部並發動羣眾開展工作。惟從這一天開始，一月所派出的邊區工作團的成果開始陸續於報上呈現。這些內容多半點出工作團進入後才發現到過往工作時由於幹部的不查，實際上土地並未真正分配。此段時期，蒙蔽幹部的原因中地主雖在其中，卻並非是唯一的原因。當進到三月後，「地主」作為破壞過往土改元凶的報導開始大量出現，卻很難說是由於康生的到來才導致。更實際來說康生在郝家坡的工作是到三月下旬結果才陸續產出，從三月初開始的「地主」風潮更多的可能是來自於工作團以及擴幹會的發現。更準確的來說，在土改的政策下，要獲得更多的土地來分基本只能從地主下手，也就是說煽動群眾鬥地主這樣的行為不需待康生發起，在工作團帶領下其實很快地便走向這一步。

當然除工作團之外，我們也不能忽視看似在完全受到上層幹部指示下的一般老百姓的動力。韓丁（William Hinton）的《翻身》雖然主要的目標在於強調土地改革對於農民實際上的好處，也為我們提供許多在生活改善背後的細節。更簡單來說，對民眾來說「翻身」所象徵的除土地以外，尚需要許多其他的物質條件來滿足。其中所需，正如土地一般，仍是要向過去的剝削者索要。「貧雇農」為主

¹¹⁸ 如〈六分區集中大量幹部 爭取春耕前完成土地改革〉1947/2/5，《晉綏日報》15，頁246。

的民眾利用《五四指示》以及隨後工作團下鄉的機會，藉機發財並非少見。其中要點之一，便是要找到剝削者。晉綏過去的成果雖然看似社會更加公平，對於想要在其他方面「更加平等」的眾人來說卻相對不利。工作團下鄉無疑提供一個新的契機，對尚有需要的眾人來說正是投其所好。¹¹⁹更何況不論是康生或是工作團，這些來自上層的團體在進入前農村往往早有打算。進村後的調查與其說是對於事實的再度確認，更趨近於將欲作為的打算藉由調查之名來得到正當性的肯認。問題與解答在實際進入農村前早已有所定本，尤其這個定案對於村中多數人有所利益時，自然不會受到任何的質疑或否定。

康生雖沒有在三月開始的風潮發揮作用，在四月劉少奇的到來以及隨後各式的會議上的「經驗分享」，其郝家坡的經驗成為之後群眾運動借鑒的參考。4月4日社論〈堅持平均的公平合理的分配土地〉揭示土改的進一步升級，劉少奇在視察後發布的講話以及隨後於4月23日的回信，也都對晉綏的群眾運動發展給予肯定，對於事態的惡化火上加油。5月7日在郝家坡為交流土改經驗，糾集各地委以及各地土改工作團負責人開會，康生的「經驗」也在此時被傳播。5月10日時已可看到〈大莊窩白家地主被釘錯成分 錯當侵犯中農利益糾正 翻案後交給群眾清算〉的報導，地主的認定可說已然由偽裝進步朝向「化型地主」前進。此門一開，其後的發展便隨著火勢愈燒愈大。5月22日社論〈有事和群眾商量〉、6月中共晉綏分局地委書記會議、晉綏日報反客裡空以及隨後的整黨、7月召開的全國土地會議、9月24日〈告農民書〉、10月《中國土地法大綱》頒布一直到11月27日〈純潔黨的組織而鬥爭〉。晉綏的火就這樣隨著群眾運動的不斷升級而一路發展，其所使用的語調、工具乃至定義基本是建立在康生的「調查」之上。《晉綏日報》所公布的各種工作團下鄉「複查」後的「發現」，更多的應證康生調查所見的種種。我們卻也即將可以看到，從12月18日中共中央工委批評《土改通訊》中〈後木欄杆文件〉開始，12月25至28日楊家溝會議後整起事件的大反轉。

¹¹⁹ 韓丁（William Hinton）著，韓偉等譯，《翻身》（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頁275-598。

楊家溝會議：糾偏的展開



關於晉綏土改中逐漸失控的情況，不論是在中央或是在晉綏的幹部基本上或多或少都有注意到。¹²⁰更準確的來說，土改愈演愈烈乃至過火的傾向並不只限於晉綏，且事態的發展大體相符，晉綏的特異之處在於其發生的時間點以及激烈程度都較他地來的嚴重。早在 12 月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任弼時已於 11 月 12 日向毛澤東就解放區政權和新富農政策問題報告，並已指出「各地分析階級不一致，做的過火點的地方，恐有將富農算做地主，富裕中農算做富農者，因此確須頒發一大體通用的《怎樣分析階級》的文件。」¹²¹。11 月 29 日中共中央將《怎樣分析階級》以及《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略加修改發下，不過晉綏分局卻未因此有所反應。1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工委的去信便針對《土改通訊》中斷定成分過於「偏左」的方式提出糾正，並「望你們詳細研究蘇維埃怎麼分析階級及其決定，並改正這種錯誤意見。」¹²²。惟《晉綏日報》12 月 19 日中卻仍有出現「工作組檢討：在許多問題上，立場思想和貧雇農不一致，和中農相同的多，成為貫澈貧雇農路線的障礙。」¹²³、12 月 20 日〈村蓋子操縱了領導權李家灣行政村貧雇農大會揭露後，當將哪些壞蛋撤職並決定查成分〉、12 月 21 日〈山陰賀家窯行政村未認真查階級評成分 代表中還有化型地主〉等等，乃至到 12 月 27 日中共中央會議開會中，報上仍可見到〈河曲沙口富農趙跟藏到農民陣營冒充中農煽動群眾報私仇 重新查階級評成分，趙某原形畢露，被群眾清算鬥爭〉的報導。不論中央已對階級劃分有所表示，或是中央工委來信「指導」，似乎都不能撼動晉綏如火如荼的群眾運動。

當 12 月 28 日楊家溝會議結束，毛澤東 12 月 25 日發表的《目前形勢和我們

¹²⁰ 或至少日後是如此聲稱，如牛崇輝，〈葉劍英與晉綏土改糾偏〉，頁 30-33

¹²¹ 任弼時，〈關於解放區政權和新富農政策問題給毛澤東的信〉，收入氏著，《任弼時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頁 411-412。

¹²² 〈中央工委關於樹立貧雇農在土改中的領導及召開各級代表會等問題給晉綏分局的指示〉，收入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 農業篇》，頁 382-384。

¹²³ 〈貧農團舉行成立大會上中農爭著叫審查自己一致表示願跟上貧雇走〉1947/12/19，《晉綏日報》19，頁 75。

的任務》通過時，轉機這才開始到來。在談話中有關土地改革的部分，毛澤東先是肯定這一段時間以來以貧農團為核心執行土地改革的成果，但話鋒隨即一轉，提到：

但是，曾經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間實行過的所謂“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過左的錯誤的政策，也不應重複。地主富農在鄉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雖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況來說，大約只占百分之八左右（以戶為單位計算），而他們佔有的土地，按照一般情況，則達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因此，我們的土地改革所反對的物件，人數甚少，而鄉村中能夠參加和應當參加土地改革統一戰線的人數（戶數），則有大約百分之九十以上這樣多。...在劃分階級成分時，必須注意不要把本來是中農成分的人，錯誤地劃到富農圈子裡去。¹²⁴

毛澤東先是透過所謂「一般情況」，為劃分階級提供明確的指導。這樣的劃分方式是否準確未必可知，不過若考量到其所追求團結多數這樣的目標，確是相當有用。就在確定「地主富農」的比率後，下一步便是為可能的錯劃這件事提出建議。這段發言也奠定對於土改全面檢討的開始，會議結束後中共中央除於 12 月 31 日發出《關於劃分階級成分問題的指示》外，也向各解放區派出大員來確保指示得到執行。

作為回應，晉綏分局很快的就根據來自黨中央的這些決議做出轉向，先是 1 月 7 日公布〈關於糾正「左」的危險的指示〉，在任弼時於 1 月 12 日發表〈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前後，〈關於改正錯定成分與團結中農的指示〉隨之公布。不論是任弼時或是晉綏分局，都是為滿足黨的意向提出辦法，只是說其實踐的層面有所不同。中央代表的任弼時，在其演說中以晉綏興縣蔡家崖作為階級錯劃的案例，指出在重劃階級前，地主富農的佔比是 22.6%。不過「據一般的估計，在

¹²⁴ 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竹內實監修，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毛澤東集》，10（東京：北望社，1971），頁 97-116。

舊政權下，農村中平均地主占總戶數約為百分之三，富農約為百分之五，合計地主富農共約占百分之八的戶數，百分之十的人數。」¹²⁵，較標準還要多出近兩倍，顯然有問題。於是按著中央下發的標準，地主富農先是下降到 16.84%，再把評定時間縮短回？到 12.26%，透過地主勞動、富農停止剝削，則戶數還能繼續往下。這一來一往的縮減雖看似有種為固定標準湊合的意味，其中意義經任弼時進一步解釋錯訂階級所造成的問題時，便能明瞭大概：「這樣只在一個蔡家崖行政村就定錯了五十多戶，約有三百左右的人口，被我們算到敵人陣營裡面去了，這不是孤立了敵人而是孤立了自己，把自己隊伍裡面的人，送到敵人方面去，是多麼嚴重的錯誤！」¹²⁶根本意義上還是在於將黨的決策傳達。

不過對於晉綏分局來說，其所面臨的問題卻並不僅限於執行黨中央的決策上，如何改正過去已然做出的指示才是首要的問題。在〈關於改正錯定成分與團結中農的指示〉中的重點，除強調要根據〈蘇維埃政府冠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以及《怎樣分析階級》兩個文件進行改正，「化形地主」與「生產富農」的名稱取消。更有趣的在於要在不打擊貧農團的前提下對過去錯訂的階級想辦法安撫，除補償還要將其階級重訂。¹²⁷如何重訂的過程，在文件中提供一套不出新亂子和防止地富反攻的辦法：

先向代表會提出討論，並事先有準備的通過積極分子在代表會中起作用，然後由代表會通過各村的貧農團、農會委員會討論，研究通過應改正的對象。先由貧農團或農會委員會，採取個別通知或小會方式通告，被訂錯者降其成分，並退還財物。公開說明理由，表明態度。一般被訂錯者，多少都有弱點，如曾有剝削等，可以由農民給以教育，並希望他和農民一條心，不應與地富結合向農民進攻。對個別鬥爭不服者，可由工作團出面，將訂錯

¹²⁵ 任弼時，〈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收入氏著，《任弼時選集》，頁 413-437。

¹²⁶ 任弼時，〈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收入氏著，《任弼時選集》，頁 416。

¹²⁷ 〈中共中央晉綏分局關於改正錯定成分與團結中農的指示〉，收入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 農業篇》，頁 385-387。

責任但在肩上。經過以上辦法使農民與他本人均滿意，再開大會宣布……。¹²⁸

這套辦法，我們也可以在之後的報導中一窺究竟。對於分局領導人來說，更重要的在於對上級的交代。晉綏分局於 1 月 23 日的報告中提出四項要點：（一）晉綏土改中左的錯誤，以老區較為嚴重，主因是訂成分與追財富大小所致。（二）左的行動，基本已經停止，這從各地來的報告和新聞稿件上可以看到。現時各地新聞來稿銳減，以致報紙目前只能暫出半張。（三）晉綏分局已發出執行中央會議精神的相關文件，分局的領導也下去各區傳達決定並幫助進行改正工作（四）由於已經進入分配土地的階段，在此時改訂成分及退還東西，現下並沒有具體材料報來。分局執行糾左的態度是堅決，在具體執行上，我們是採取了有步驟、較緩和的方針。第一步先糾正顯然錯了的，下一步再糾正不好區分的，最後以做到完全徹底糾正為止。經和各地實際工作的同志商討，大家一致認為不能太猛，因恐貧雇農一下不易接受，反予壞份子以打擊新生力量之機會，故暫不在報上簡單號召糾正左的錯誤，以具體糾正中成功的例子，陸續在報上報導，以推動各地一致執行。¹²⁹透過「選定」事實的報導，報紙本身也成為如同過往調查般建構正當性的工具。

上面的意見落實到《晉綏日報》上，則自 1948 年 1 月 1 日發布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後，雖間有群眾熱烈學習的報導，有關於階級的重訂、團結中農等議題卻並沒有如同 1947 年群運正熱時一般即時的反應。到 1 月 17 日，才有〈習仲勳同志下鄉檢查土改工作〉的報導，且也只是轉述新華社 1 月 13 日來電。18 日，同樣地透過新華社西北電，轉述綏德義合、延家川兩區工作團檢討發動貧雇農團結中農的問題。一直到 1 月 26 日頭條，〈興縣劉家曲 訂成分犯了「排三代」的興縣劉家曲 訂成分犯了「排三代」的錯誤，訂錯的成分已經改正，老孟等又回到農會來了人人皆大歡喜〉一出，有可以佐證的案例後。可以見到隨

¹²⁸ 〈中共中央晉綏分局關於幾個問題中糾正目前左的偏向的指示〉，收入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 農業篇》，頁 396-98。

¹²⁹ 〈中共中央晉綏分局給毛主席的報告〉（1948/1/23），收入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 農業篇》，頁 464-465


後則 27 日〈興縣康寧鎮行政村土改中，錯把部分中貧農劃為地富 農民大會上宣布改正〉、29 日〈參考資料 毛澤東論依靠貧農與團結中農〉、2 月 1 日〈工作組依靠少數青年民兵 郭家攤訂錯了一些成分，工作團另派人幫助，訂錯的都已改正〉〈下了破產地主帽子 七斤老婆來參加會了 五寨梁家坪改正成分〉、2 月 2 日〈興縣胡家溝改正錯訂成分 六位農民重新歸了隊 壯大了農民力量，皆大歡喜〉；隨著連續幾日報導中關於改訂階級一事的逐漸鞏固，晉綏分局於 2 月 2 日公布〈關於幾個問題中糾正目前左的偏向的指示〉，進一步的針對自 1 月以來幾項布告實施的補充，尤其是關於改訂成分上，先就群眾所容易通過的錯訂成分配合分配土地同時求得解決。這些要求的正當性隨著往後數日重訂成分的報導不斷增強。到 2 月 10 日，當局更趁著正月初一就地權保障事宜發出公告，要求各地迅速改正錯訂成分，消除中農顧慮，使農民敢於大膽發展生產，勞動致富。¹³⁰ 當事態進行到此，改正錯訂成分的正當性以及急迫性已然受到充分保障，甚至當毛澤東於 4 月 1 日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發表講話後的 4 月 8 日仍然可以見到〈太平改正成分後中農放心生產耕牛增加一倍〉的報導。「糾偏」被如此慎重的對待與執行，卻也不禁令人想問早知如此，又何必當初呢？

這個疑問，李井泉在 2 月 28 日在興縣二區農民代會上已然提出解答：

有一條錯誤，劃成分劃錯了。毛主席講，根據他的調查，地主富農占百分之八上下，就是說一百家裡只有八家上下。根據現在各地情形來看，確實也就只有百分之八左右。我們有劃到百分之二十、三十，甚至百分之四十。這是一件大錯。這個錯不怪你們，也不怪工作團，只是怪分局，怪我。我就是不懂怎樣劃階級。毛主席說，剝削關係是劃階級的唯一標準。可是現在增加了兩條，一個是排三代，一個是鋪攤，加了兩條進去，把剝削關係一條就並列了，就出了問題，就劃多了。

…毛主席為什麼敢提出消滅封建半封建，因為地主階級百家只有八家左

¹³⁰ 〈晉綏分局緊急通知〉1948/2/10，《晉綏日報》19，頁 259。



右，能夠打倒它。我們不懂這個道理，以為多幾家沒關係吧，實際上，如果訂多了，就一定侵犯中農利益，中農一定恐慌，農民不贊成。錯下來的結果怎樣呢？有的人大吃大喝，怕鬥了地主富農鬥中農，不好好生產。還有本來不是地主富農，得罪他，他記下來，影響團結，也有訂錯成分自己尋死的，這個問題滿大的。我們本來鬥地主，結果鬥了農民，鬥了自己人，這叫犯了錯誤。這是最大的。

簡單來說，問題都是由於分局，或說李井泉不明白毛主席深思熟慮下自做主張才導致問題發生。不過，這個責任卻也不全在分局：

…這回成分劃高一方面是上面沒標準，下面是不是為了翻身，多加幾戶地主富農？

上下交互的後果，卻終究需要改正。改正的手法也正如同前面文件所要求一般，只是更加細緻化：

…現在有個最難解決的問題，就是下成分退東西。這一條共產黨的主張堅決改正。把自己人推到敵人方面，地主富農喜歡我們多趕些人到他們哪裡頭，他們利用訂錯成分的人打擊我們。因此鬥錯了退東西共產黨也是主張堅決退的，要實事求是的解決問題。現在有些人說，衣服穿了，羊殺了，不能賣老婆賣地來退。這怎樣辦呢？我們貧雇農中農要向訂錯的人做一番工作。現在有些村子，一家要退，一家說沒啦，這就不能解決問題。我們貧雇農鬥地主分到衣服，土地，說不退好嗎？總比過去強，為了團結百分之九十的人，為了生產，給人家賠個不是，賠禮，說清楚道理。工作團做錯的也要賠不是。貧雇農裡面，把那些怪話也要糾正糾正，你們還是得到好多東西，口糧種子，衣服總是分到了的，說怪話是不對的，給訂錯的人賠不是，認錯誤，先消氣，後退東西。有些東西分了，同他們商量怎樣退法。現在有些下了份的人找上村來要東西，這是因為我們沒有找人家，好

話沒有說一句，東西一點不退，人家不高興。還有一些同志表現洩氣，我們既能夠打倒封建，也能把做錯的事改正好。¹³¹

不但過錯要糾正，更重要還在於將錯拿的東西退回，這是由於共產黨是個實事求是的政黨。表面上來看，知錯能改，且問題不是因為上層路線有過，是因為下層不解才導致錯誤的發展。順著一路看下來，就會發現到明明不論中央或地方都有若干次可以將事態緩和的機會，卻仍然坐視其逐漸升溫。「實事求是」之於共產黨究竟是一個堅定不移的準則抑或只是信手捻來的工具，只怕有許多可以討論的空間存在。

前述已經提及土改中農民開始或因為分階級所產生的利益而踴躍參加，隨著不斷開會重訂階級所獲得的利益愈來愈少，參加的動力也逐漸降低。即便如此，上級仍是透過各種機會要求農民參與。透過對於當時局勢以及脈絡，可以發現到這一連串的舉動若以後見之明來看實在難以理解，在難以獲得進一步證據的狀況下本章由是透過科層間彼此爭功的理路思考。或許回到當時的情況下，晉綏分局不斷下達指令的行為背後可能有著即便透過檔案與文字卻仍無法觸及的動機。這樣的動機，礙於現有資料的限制我們很難過度的去推想。可以確定的是，大凡科層體系基於經費以及人力的限制，對於日常以外的工作多少抱持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精神。這種精神能否因為革命的熱情而克服，單就官方文件來看或許說不得準，不過若是無用之功要維持一整年怕也是不得不思考其中可能的效益。好比說透過密集集會的同時，即便底層已然喪失熱情卻仍能夠透過集會將動員的效力維持等等。雖然在缺乏證據的當下只能猜想，或許進一步研究的可能卻也需從此出發。

¹³¹ 李井泉，〈井泉同志在興縣二區農民代表會上的講話〉（1948/2/28），收入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 農業篇》，頁 469-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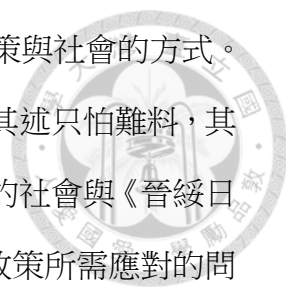
「調查」的運用



到得 1948 年 4 月毛澤東路過晉綏時，1947 年一年的騷動已然被視為解決。其中造成的死傷與破壞難以回復的同時，作為煽動羣眾的負責人，不論是康生、劉少奇、李井泉卻無一有負責的需要。不過如一開始所提及的，本章的目的不在於評判誰該負責，是試圖就所謂「調查」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探究中國共產黨調查研究文化運作的虛實。雖說本章所使用的材料在相當部分並非嚴格定義的「調查」，看似可能因此會招致疑問。當我們將調查的定義進一步概念化，並檢視所謂調查與政策的互動時。會發現到兩者間的關聯並非十分明確的先有調查後有政策，更多的時候調查是用以作為政策的檢視進行。政策實際推行的成效如何，除調查並無其他佐證，更別提說隨著土改進行一再出現的否定過去工作成效。限於資料我們無法檢視調查本身的真偽，1947 年到 1948 年中對過往調查的否定與再肯定以及對於社會的破壞也使得究竟現實狀況如何難以再次的被檢視。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得不重新省思「調查」實際的用處與定義。

回頭來看問題起源的《五四指示》，對應到其發佈時間可以發現到其主要的目標是針對新佔領的東北解放區。希望透過此一宣示，為即將到來的國共內戰建構正當性並補充兵源。問題就在於其目標雖然是以東北為主，但實施的範圍卻是涵蓋整個共產黨主政的地方。為回應這樣一個不向其他解放區所問，東北之外黨部卻又必須回答的狀況，各式需要解決的「問題」也因此必須產生。調查的作用，理論上即在於回應需要解決的問題。不過當問題的主體是來自於回答者之外時，則問題本身也成為回答者在回應之前需要建構的一環。

而這種自問自答也正是官方喉舌所扮演的角色，恰如其分地將角色扮演好的《晉綏日報》，使得我們可以跟著其報導所反映出的視角一窺官方對於問題的態度。作為佐證，1946 年 9 月一連串有關糾正侵犯中農利益的報導與隨後官方透過調查定調的出現，其間的關聯讓我們發現到很多時候官方政策並非單單依靠對於現實的調查，是能更有彈性地透過報紙建構出一套其所認定需要解決的問題。



透過康生，我們更發現到「調查」所具有的彈性以及其影響政策與社會的方式。康生調查與過往調查所揭示出現象的不同，實際社會是否真如其述只怕難料，其透過調查建構出的社會卻是充滿著各式的問題。這邊所建構出的社會與《晉綏日報》的報導建構出的社會難說何者更貼近事實，可以確認的是政策所需應對的問題是來自於這兩者建構出的社會。如何透過紙面建構社會，從康生的表現來看或許更多的根據是來自於調查者的主觀而非實際的樣貌，「化型地主」的概念便是最明顯的佐證。當調查的概念一經打通，「調查」與「報導」間互通的疑問也即不攻自破。

隨著我們擴大對於「調查」的檢視，便能更體會其運用的精妙。更仔細的來說，其實整起運動的核心問題脫不開所謂的「階級判准」。調查的目的從 1942 年開始一直到 1948 年基本上都是為透過土地分配的狀況並以此界定「階級成分」。若是只以土地為核心斷定階級，對於長期做為解放區的晉綏來說到得 1946 年〈五四指示〉頒發後便會出現當其他解放區正在轟轟烈烈進行時晉綏卻相對沉寂的窘境。即便要發動羣眾卻也往往無從可發，好不容易發動起的羣眾所獲得的利益，若是真的按照過去調查的結果作依歸，則多半還要歸還回去。這也正是 1946 年 5 月開始一直到 9 月晉綏解放區所面臨的狀況，〈怎樣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推出某種程度上來說或許更多的反應出其自我克制的一面。惟這種克制心終究不敵周遭愈演愈烈的局勢被放棄，因應戰爭以及春耕等等的要求卻也使得其即便要有所作為也只能在有限度的狀況下進行。卻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1947 年 1 月派出的工作團以及 2 月由中央派來的工作團再一次地透過「複查」將問題擴大。此次「複查」之所以重要，除基於對過往的否定外，更重要是在於劉少奇的進一步肯定。羣眾運動也由此一路燒下去，隨後不論是〈告農民書〉、〈反客裡空〉都可以說是隨著羣運發展下的成果。這把火卻也隨著上層態度丕變而獲得控制，不論是楊家溝提出調查因此改變中央態度，或是透過報紙形塑調查糾偏的事實，「調查」的文本或展演都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雖然本論文係以「調查」作為討論的主體，且因為調查作為一種文本不論在

傳播或發揮作用實際上都具有相當程度的侷限性，切入時多半係以官方的立場出發而可能忽略掉使得運動成功的其他面向。本章雖然多少試圖透過民間的反應以及官方行為背後的心態作為另一面的補充，卻可能受限於篇幅難以進一步展開。即便如此，仍是希望能夠透過這些段落為後續的研究提出可能。

本章以晉綏土改與糾偏作為切入，一探在延安整風後中國共產黨「調查」實際運用的巧妙。若說 1942 年開始到 1946 的調查為「常態」，則 1946 年下旬開始到 1948 年的「變態」在兩相比較下更能讓我們注意到其操作上的彈性。這種彈性的緣由或許是因著科層爭功；或是因著政策走向，主要的操作往往係藉由標準的改易使調查能夠滿足所需。如何在不否定根本路線上對過往「糾正」卻也要依賴調查，用所見改變上層心意；用行動佐證新的「現況」。在革命需求的前提下，原本不存在的問題透過科學化的調查被重新發現並獲得解決，反之當革命提出新的標準時，同樣符合科學的另一套方式也將滿足其需要。科層藉由調查來滿足革命，而革命的正當性也因此獲得保證。



結 論 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過去的種種一瞬間都自動獲得正當性。隨著革命的成功，曾經被掩埋的革命文物也因此再度重現在世上，《尋鄔調查》便是其中一例。即便建國後仍然有不少的問題需要解決，「調查研究」持續廣泛地在全國各地進行。已然重現的《尋鄔調查》卻並未因此得到再度出現在世人眼前的機會，是一直要到大躍進宣告失敗，四清啟動的前夕才有限度的出現在幹部學習材料中。全面的公開，更是要等到鄧小平掌權後，方透過《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出版。其先後兩次的「再現」，本身都是為因應前所遭遇的困境—脫離現實的虛妄產生之災難—才將其從過去招喚到當下。可以說，《尋鄔調查》的再發現為黨的高層提供一套將過往革命經驗重新帶到現實的方式。這一套長久以來我們理解中國共產黨「調查研究」的主流敘事，有意識地將問題簡化，將問題發生的原因歸咎到下層幹部忽略實際狀況，才導致高層喪失對實際狀況理解，進而使得問題發生。

當順著這樣的敘述下，似乎也回應既然共產黨如此重視調查研究，卻又為何會有如大躍進等災難出現的疑問。乍看能自圓其說的論證，卻反更令人想要瞭解究竟所謂過去成功經驗其運作的機制。本文即從此疑問出發，從中國共產黨，更精準地來說，毛澤東的調查由來開始，從廣東、尋烏再到延安，一窺「調查研究」進入共產黨的歷程。並進一步的試圖透過晉級的案例來檢視調查實際落實的方式與作用。在檢視共產黨的「調查」時，首先必須直面的問題便是如何看待所謂的「調查」，這個調查跟李景漢等人作的學術調查有差別嗎？為回答這個問題，本文首章從「農村調查」的背景開始，指出其本身所帶有的強烈目的性。這種目的性也導致論述上極有可能會與所觀察的現實有相當的落差，更直接說其實從《尋鄔調查》就能看到這樣的傾向。在毛澤東調查時亦有加入並提供過去的紀錄的尋烏人劉淑士的紀錄與毛澤東所完成的調查相參照，兩份文本的關注焦點、細節與解方所呈現的歧異，在某種程度上對於過往宣稱中《尋鄔調查》的客觀性提出挑

戰。雖然兩份文本存在著時間的差別，基本架構的距離卻讓時間所可能形成的區別弭平。同樣的土地但不同的問題透過不同的角度竟能有如此不同的解決方式，也為「調查」所宣稱的普世性提出疑問。

單單即便梳理毛澤東調查研究核心的來由，卻並未解決調查研究與共產黨其關係的發生。即便或能以此做為共產黨調查研究的植株，但《農村調查》實是於 1940 年方才大規模的印行，且《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的研究的決定》以及《中央關於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等表明調查研究為中國共產黨核心概念一環的文件也是在 1941 年下旬發布，歷經十一年才成熟結果。這十一年中植株到發芽、成熟中間的經過也非循序漸進，植株到發芽中間就歷經八到九年的時光，成熟卻好似一瞬間，不到幾個月就成功開花結果。從「狹隘經驗論者」過渡到「馬克斯列寧主義的態度」，其中反映的更多是毛澤東作為黨內正確路線的宣示，作為毛澤東路線一環的調查研究透過毛澤東獨一地位的確立成為黨的論述。從論述到建立「文化」並無法直接劃上等號，若說 1941 年政治局擴大會議將調查研究昇華為論述，將論述深入到黨員心中成為「文化」卻是要到延安整風方得以實現。不論在論述乃至文化，成就「馬克斯列寧主義的態度」更多是來自於毛澤東地位的上升與鞏固，革命的調查與不革命的調查其間的差異也就在於論述與工具定位的不同。

晉綏的案例則更生動的帶給我們調查研究此一文化實踐的機制，從 1942 年開始一路積累的對於晉綏解放區的認識與理解，當 1946 年〈五四指示〉發布後隨著需求的不同，往往輕易地透過定義的改變將過去一筆勾銷。更具體來說，對過去的否定是植基於對社會認知的再建構，《晉綏日報》上的各式報導提供與過往調查全然不同的面貌。有趣的是，幾個月後開始的糾偏也是以調查為本所展開。說到底不論調查或是報導的書寫，本身都是一種將社會透過文字再建構於紙上的嘗試。要論證晉綏從 1946 年下旬開始到 1948 年初於各式報紙、調查中所呈現的多種面貌何者為真又何者為否係一不具實際意義的發問。該問的問題是當時這些調查、報導對其時政策的推行提供什麼？雖說到最後會有究竟是雞生蛋或是蛋生雞般的因果困境，很難說是因為調查才產生政策或說調查本身就隱含著對政策的

肯定，可以發現這一年多時間中社會形貌的變化與政策推行的高度連結。換言之，解題的核心在於理解到調查因應政策需要而具備的高度彈性。與其說調查揭示社會的問題，不如說問題是透過「調查」才被「發現」與「解決」。短時間內同一區域歷次調查中的各式矛盾，其反應的與其說是社會的大幅度改變，更貼近是為政策推行建構出的不同表象。也因此，為何注重調查的中國共產黨仍會發生諸如大躍進等災難，絕非所謂基層幹部刻意製造假象幾句話就能解答。所謂「實事求是」調查不但打從開始便是目的性的為革命而生，再配合上滿足科層體制行政的需要，到最後愈是貼近「馬克斯列寧主義態度」的調查與實際的社會就愈來愈遠，災難也就因此不斷發生。

乍看之下會認定中國共產黨的調查研究本身全然係其政治謀略之一環，無甚可取，這並非本文的意旨。確實順著研究的開展，很容易發現到調查研究的高度政治性。從其發展伊始到進入中國共產黨的語境再到實際上的操作看似無不是政治運用的一環。要說 1942 年到 1946 年一連串的調查全無政治意涵也略顯超過，某種程度上來說所謂的政治化與否取決於「客觀」標準建立的有無。雖說光是「客觀標準」都有不少爭議，至少長期穩定且一致的判準或多或少為所謂客觀建立一定的標準。政治性運作的開始便在於發現若按照過往標準無法滿足其需求時，透過新標準的建立再次翻案，此亦即是本文敘述中國共產黨調查高度彈性的一面。在論證中國共產黨調查的獨到或是優勢時，更多的是強調其調查相較國民黨來說更為貼近真實。本文以此出發對此一論述提出相異的觀點，並非否定中國共產黨調查所有的獨特性，若說已被否定的見人所不能見是其表徵，「何以」見人所不能見或許更加引人注目。關於這個疑問，本文雖然並未有直接的答案，或許可以順著李金錚所提過的概念：當共產黨在鄉村已然將過去的「經紀」消滅殆盡，則其對社會的掌握自然能使其達到過往所不能及的境界。¹³²某種程度來說，共產黨

¹³² 李金錚，〈「理」、「利」、「力」：農民參軍與中共土地改革之關係考（1946-1949）—以冀中、北嶽、冀南三個地區為例〉，頁 87-134。另外，經紀問題的討論參杜贊奇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 年的華北農村》。

的調查與過往的差別，也正在於能將過去不被納入調查的群體一同含括。雖說能否以此做為其資料自然更為全面或有待商榷，也因此其調查與現實的距離亦非他者所能及。惟即便如此，調查作為產出的文本不能離開實際運用存在，本文強調的面相即集中在其因應政治運用需求的高度彈性。

總結來說，如此高度彈性的調查不能一概因其政治性否定效用；亦非如過往強調中具備的科學與客觀。本文的目的並非是希望對過去已有的對於中國共產黨調查之相關研究翻案，希望能回答 2015 年 7 月第一次田野以來的疑問：到底為何都是革命政黨，國民黨與共產黨對於調查的態度會有如此之不同。在研究的過程中也發現到問題並非能單從兩黨做的調查下手就能釐清，因為兩者看待調查其實並不在同一個層面上探討。要解決問題終究還是要回到共產黨體制以及科層機制運作兩個環節的互動。從綱線的提供到作為主體的革命需求，共產體制建構出的外圍框架成為黨內科層體制在實際運作上必須顧及的要項，也同時提供政治運作的空間。正當化毛澤東路線的調查也同時正當化隨後各式的政治活動，運作上的前後矛盾則亦能以此化解。路線無誤，有問題的總是下屬對現實認識不清或有意欺瞞。當調查被賦予作為實踐路線的手段時，科層體制的應變之道便是將其中彈性發揮到最大。即便如此，由於路線的詮釋權並非由科層體制掌握，「彈性」的掌握仍然操之於上。

「調查」作為清末以來現代性展現的一環，長期以來被革命者高舉作為其行為的背書。「革命」順著依附在現代性下正當化的脈絡發展，看似言之成理的論述卻因著國共兩個革命黨的發展殊途有進一步思考的空間。本文透過兩個脈絡梳理中國共產黨的調查文化：「革命」以及「科層體制」。首先的重點便在於如何在「正當化」之下理出這兩者，於是乎先是透過毛澤東與劉淑士兩人觀察的差異，揭露革命者與外人兩者之間的隔閡。再藉著延安整風一窺透過革命如何藉由被包裝的正當化進入科層體制。最後以晉綏作為科層體制如何運用革命包裝為本身辯護作結。雖說限於討論的篇幅並未能完全展開此間關係的全貌，至少透過本文的梳理能夠對於中國共產黨的運作與文化能有一切入的角度。還原調查的同時也開展進一步討論的可能。

徵引書目



傳統文獻

1. 《晉綏日報》。
2. 《解放日報》。
3. 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 農業篇》，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頁 485-490。
4. 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編研部編，《尋烏調查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步》，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5. 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晉綏革命根據地大事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 中共呂梁地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編，《晉綏根據地資料選編（第二集）》，出版地不詳：中共呂梁地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1983。
9.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中國報刊史研究室編，《延安文萃》，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10. 托爾斯泰著，耿匡譯，〈社會調查問題（未完）〉，《新社會》，1919：1，出版地不詳，1991，頁 4-5。
11. 江西省尋烏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尋烏縣志》，北京：新華書店，1996。
12. 李景漢，〈社會調查在今日中國之需要〉，《清華周刊》，38：7、8，北京，1932，頁 1-8。
13. 浙江同鄉會，〈浙江同鄉會調查部敘例〉，《譯書匯編》，2：10，出版地不詳，1902，頁 105-114。
14. 高級黨校中共黨史教研室編，《毛澤東農村調查》，出版地不詳：高級黨校中共黨史教研室翻印，1961。
15. 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等編，《張聞天晉陝調查文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
16. 張稼夫述，束為、黃征整理，《庚申憶逝》，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
17. 黃仁宇著，張逸安譯，《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18. 解放社編，《整風文獻》，北京：新華書店，1950。
19. 廖仲愷，〈農民運動所當注意之要點〉，收入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資料選編》，頁 127-132。
20.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21. 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資料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2. 劉淑士，〈尋鄔的『八面風』〉，《尋鄔》1:6，北京，1924。
23. 劉淑士，〈尋鄔的『八面風』(續附表)〉，《尋鄔》2:1，北京，1925。
24. 謝竹銘，《尋鄔鄉土志》，1937。
25. 劉淑士，〈尋鄔的八面風(續)〉，《尋鄔》2:2，北京，1925。
26. 曾加俊，〈改革尋鄔商業的我見〉，《尋鄔》1:3，北京，1924。
27. 王維藩，〈振興吾邑商業之芻議〉，《尋鄔》，北京。
28. 竹內實監修，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毛澤東集》，1-10，東京：北望社，1971。
29. Mao, ZeDong. *Report from Xunwu*.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Roger R. Thomps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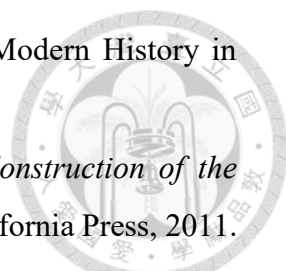
近人論著

1. 牛崇輝，〈晉綏土地改革運動中的康生〉，《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4，臨汾，頁 107-109。
2. 牛崇輝，〈葉劍英與晉綏土改糾偏〉，《紅廣角》，2011：10，廣州，頁 30-33。
3. 牛崇輝，〈謝覺哉與晉綏土改〉，《山西檔案》，1992：5，太原，頁 33-34。
4. 牛新宇，〈任弼時與晉綏邊區土地改革〉，《黨史文匯》，2012：4，太原，頁 54-57。
5.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
6. 王奇生，〈民國時期鄉村權力結構的演變〉，收入周積明、宋德金主編，《中國社會史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下冊，頁 549-590。
7.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 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上海書店，2010。

8. 王遠義，〈惑在哪裡—新解胡適與李大釗「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及其歷史意義〉，《臺大歷史學報》，50，臺北，2012，頁 155-250。
9. 任偉偉，〈南京國民政府社會調查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12。
10. 任弼時，《任弼時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1. 江勇振，〈Tong Lam, A Passion for Facts: Social Survey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1900-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9，臺北，2013，頁 173-199。
12. 牟永如，〈清末社會調查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
13. 何立波，〈《晉綏日報》與反「客里空」運動始末〉，《鐘山風雨》，2014：1，南京，頁 4-7。
14. 何東、清慶瑞等編著，《中國共產黨土地改革史》，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3。
15. 呂芳上等，《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台北：時報出版，2011。
16. 李金錚，〈「理」、「利」、「力」：農民參軍與中共土地改革之關係考(1946-1949)—以冀中、北嶽、冀南三個地區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93，臺北，2016，頁 87-134。
17. 李金錚、鄧紅，〈論抗戰時期張聞天主持的晉陝農村調查〉，《抗日戰爭研究》，2008：1，北京，頁 183-209。
18. 李章鵬，〈清末中國現代社會調查肇興芻論〉，《清史研究》，2006：2，北京，頁 75-81。
19. 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 著，王憲明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20. 杜贊奇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 年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21. 汪朝光等，《天下得失：蔣介石的人生》，香港：中和出版，2012。
22. 施路赫特 (Wolfgang Schluchter) 著，顧忠華譯，《理性化與官僚化：對韋伯之研究與詮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
23. 范偉達、王競、范冰編著，《中國社會調查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24. 馬飛，〈山西臨縣 1946-1948 年的土地改革運動〉，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1

- 
25.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26. 張玉法，《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山東省，1860-1916》，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
 27. 張智璋，〈蔣介石與現代國家的建構：以 1930 年代江西的地方政制改革為例〉，《政大史粹》，28，臺北，2015，頁 1-37。
 28.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調查」條。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t/gswweb.cgi?ccd=yO1IIIH&o=e0&sec=sec1&op=v&view=0-1>。引用日期：2017 年 4 月 13 日。
 29. 畢春麗，〈毛澤東調查研究實踐論析〉《中國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5，山東，頁 74-77。
 30. 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
 31.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
 32. 陳永發，《延安的陰影》，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33. 陳逸達，〈暴風驟雨：中共東北土地改革 1945-1948〉，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34. 陳耀煌，〈傳統與現代：中共土地改革的歷史意義再思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00，臺北，2015，頁 171-182。
 35. 尋烏調查紀念館編，〈習近平同志談尋烏調查〉（習近平原題〈談談調查研究〉）《尋烏調查史料選編》，尋烏調查紀念館，江西。
 36. 尋烏調查紀念館編，《紀念毛澤東尋烏調查 85 周年論文集》，江西：尋烏調查紀念館，2015。
 37. 智效民，《劉少奇與晉綏土改》，臺北：秀威資訊公司，2008。
 38. 游海華，〈清末至民國時期贛閩粵編區市場網絡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6：4，廈門，頁 62-73。
 39. 程敏編，《黨內大奸》，北京：團結出版社，1993。
 40. 黃仁宇，《大歷史不會萎縮》，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 
41. 黃興濤、李章鵬，〈現代統計學的傳入與清末民國社會調查的興起〉，收入黃興濤、夏明方主編，《清末民國社會調查與現代社會科學興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頁 1-46。
 42. 楊忠虎、劉曉梅，〈張聞天在延安整風期間的調查研究活動〉，《中國延安幹部學院學報》，2009：3，延安，頁 54-58。
 43. 賈巨川，〈習仲勛在土改中防左糾偏〉《炎黃春秋》，2007：10，北京，頁 32-37。
 44.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著，閻小駿譯，《安源：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4。
 45. 趙晉，〈晉綏土地改革的成績和偏差〉，《理論探索》，1990：2，太原，頁 73-75。
 46. 劉意，〈關於毛澤東《尋鄔調查》的研究述評〉《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3，成都，頁 7-11。
 47. 盧毅，〈論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4：4，徐州，2008，頁 99-105。
 48. 穆欣，《晉綏解放區鳥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
 49. 戴鴻超，《槍桿、筆桿和權術 蔣介石與毛澤東治國之道》，台北：時報，2015。
 50. 韓丁（William Hinton）著，韓涼等譯，《翻身》，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51. 羅平漢，《土地改革運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52. 羅平漢，《中國共產黨農村調查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53. Chiang, Yung-chen. *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19-194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54. Erbaugh, Mary 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Hakkas: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s a Hakka Enterpris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2 (Dec., 1992), 937-968.
 55. Fan, Fa-ti. "A Passion for Facts: Social Survey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1900-1949 by Tong La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2, No. 2 (May 2013), pp. 452-453.
 56. Flower, John M. "A Road Is Made: Roads, Temples, and Historical Memory in Ya'an County, Sichua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3, No. 3 (August 2004), 649-685.

- 
57. Huang, Philip C. C. "Current Research on Ming-Qing and Modern History in China." *Modern China*, Vol. 5, No. 4 (October 1979), 503-523.
58. Lam, Tong. *A Passion for Facts: Social Survey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State, 1900–194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59. Liu, Wennan. "A Passion for Facts: Social Survey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1900-1949 by Tong Lam."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24, No. 4 (December 2013), pp. 913-916.
60. Yang, Guobin. "A Passion for Facts: Social Survey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1900–1949 by Tong La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19, No. 3 (November 2013), pp. 861-862.
61. Zhang, Baohui. "Communal Cooperative Institutions and Peasant Revolutions in South China, 1926-1934."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9, No. 5 (October 2000), 687-736.
62. Tucker, Robert C. *Stalin in Power: The Revolution from Above, 1928-1941*, New York : Norton 1992.